
纪念王光祈先生
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王光祈
成都市温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110周年

温江文史（总第十三辑）

川成新出内字（2002）第492号

温江耀麟印刷厂



王光祈（1892.10.5——1936.1.12）



王光祈故居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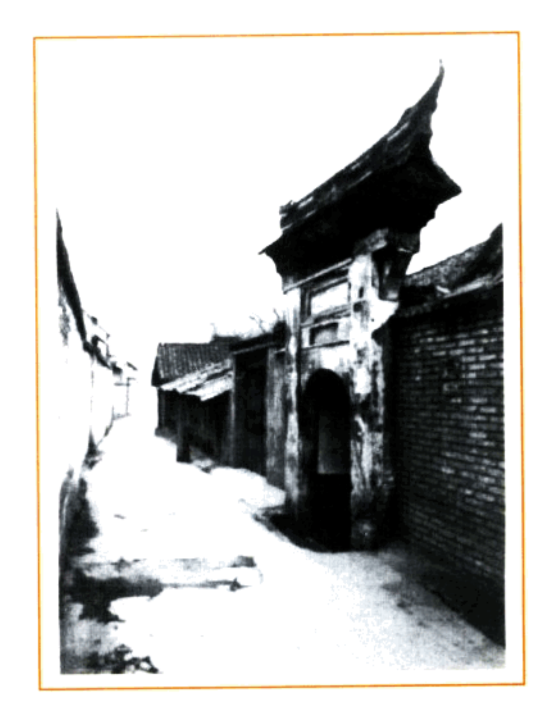
1892年10月5日（农历八月十五日），王光祈出生于四川省温江县鱼凫镇小河村（今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永宁村）。

庆丰街三官庙私塾遗址

这里是少年光祈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塾师蒋春帆为其讲授旧学，传播爱国民主思想。

社学巷（光祈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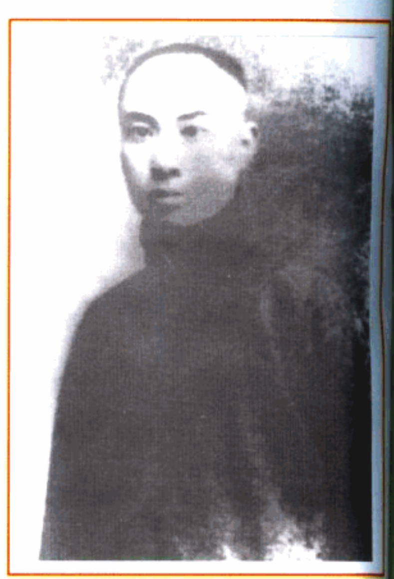
王光祈幼年在此处一所家塾附读。一九三六年王光祈辞世后，温江人民为了纪念他，曾一度将其更名为『光祈巷』



石室校址

1912年，王光祈毕业于成都府中（即石室中学）。





"五四"前后的王光祈先生

锺健先生：

前几天接到通告，知 先生当选执行部主任。今日又接来示，嘱补填入会愿书，今已照填，并将附单照填上。惟介绍人係王光祈和我共五人，我现在只能记得三人，约二人要问王光祈才能知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为荷。

泽东

寄

北京后门内吉安所东夹道六号（三眼井）

杨锺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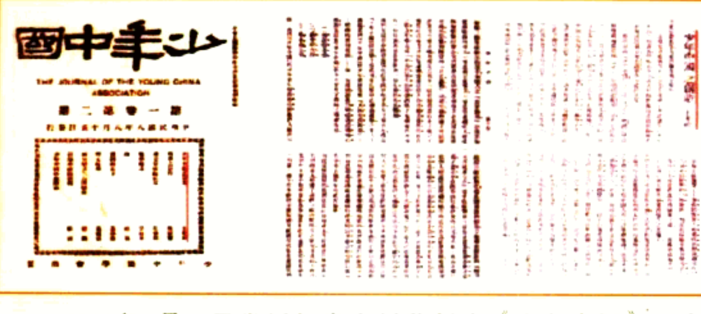
长沙文化书社毛

毛泽东在给杨钟健先生的复信中谈及王光祈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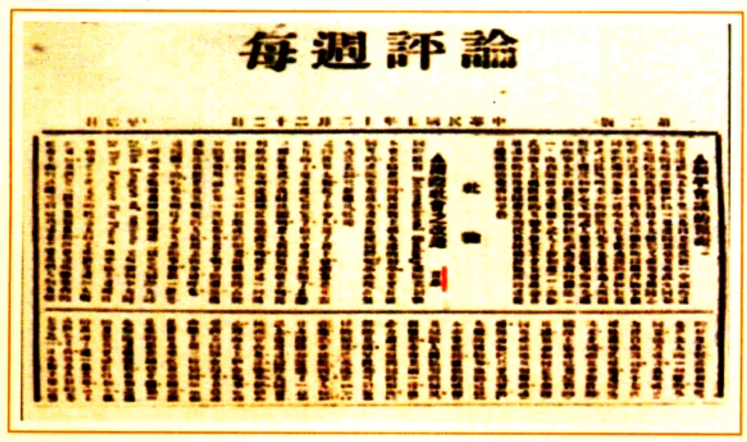
1919年7月，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被选为执行部主任，主持学会的工作。右三：李大钊；右五：王光祈；右九：邓中夏。（成都市温江区档案馆提供）

王光祈赴德留学前与学会同仁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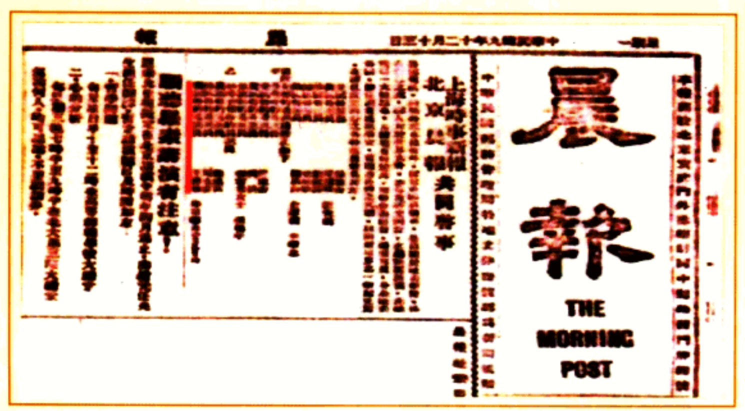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1918年6月，王光祈与李大钊等创办《少年中国》，宣传新文化，研究新思想。


每週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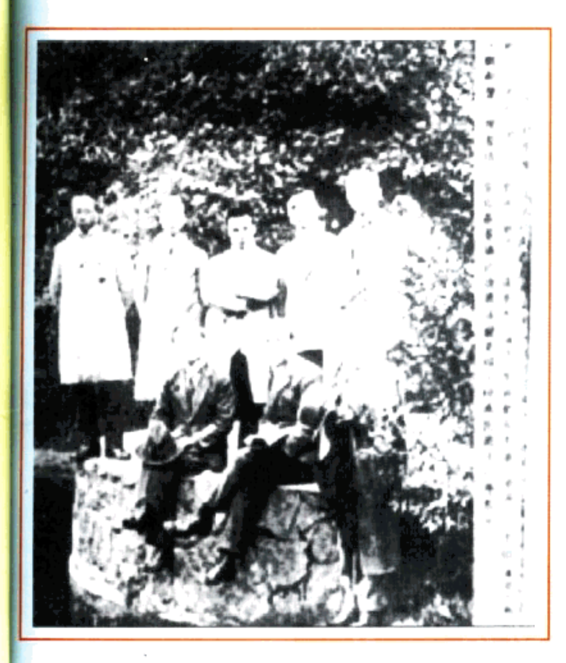
1918年底，王光祈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五四时期重要刊物《每周评论》，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晨報

THE MORNING POST

1919年5月，王光祈与李大钊、瞿秋白担任《晨报》编务，在《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

1920年7月，王光祈（左二）与周太玄、宗白华、魏嗣銮在德国法兰克福野外会商“少年中国学会”有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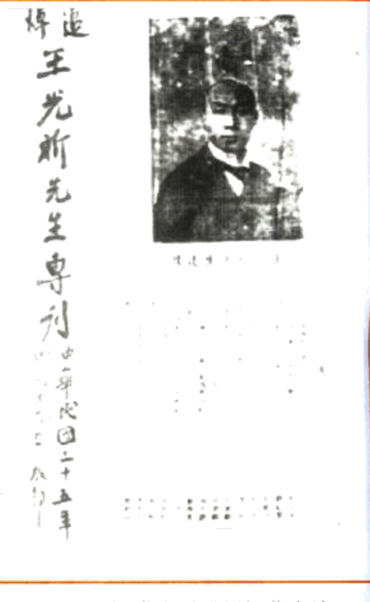
1922年冬，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前右一）、曾琦、张梦九等与会员李璜、魏嗣銮、宗白华等在德国法兰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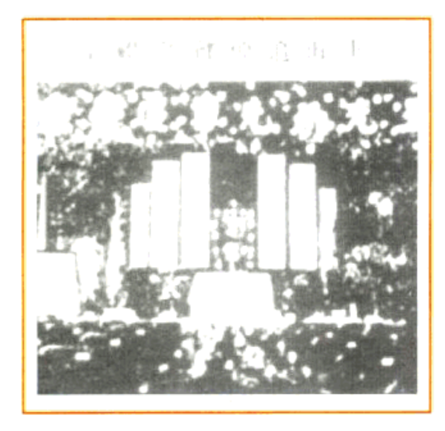


徐悲鸿手绘王光祈先生遗像



1936年3月15日，南京学术界举行追悼会，会议由蔡元培主持。





上海追悼会

1936年成都出版的“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封面：座落于王光祈纪念馆门前的王光祈塑像

封底：座落于四川音乐学院内的王光祈碑亭

政协第十届成都市温江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郑华钰

副 主 任：赵露长

顾　　问：江绍荣

成　　员：左宏星　张　炜　谷桂林

贾冬焕（女）　郭永棣

倪　亮

《温江文史》第十三辑编辑人员

编　　审：何成忠

主　　编：郑华钰

编　　辑：郑华钰　赵露长

校　　对：郑华钰　倪　亮　李　昱

图片摄影：郭永棣

版式设计：郑华钰

封面设计：赵露长

序

成都市温江区政协主席　宋崇文

王光祈（1892—1936）先生，字润玙，笔名若愚，温江人。他是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本世纪卓越的音乐学家、音乐史学家。光祈先生出身贫寒，八岁时就为附近农家放牛，仍坚持在艰苦的生活中勤奋攻读。以至他远离家乡出川游学，到后来留学德国期间，都一直坚守着这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正如他 22 岁出川时在《夔州杂诗》中所写的"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为了理想，为了学习，他几十年孤苦奋斗，生活上极为简朴，而治学却严肃、刻苦，充分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是值得我们后人认真学习的楷模。

光祈先生不仅是一位不平凡的学者，他更是一位卓越的爱国主义者。早在 1911 年，他就积极投身四川保路运动，高唱《保路歌》，参加罢课。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他立即剪掉辫子，表示与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决裂。1918 年 6 月，他和李大钊等共七人发起组织当时规模最大的著名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宣传新文化，研究新思想。他先后介绍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赵世炎等加入该会。年

底，又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每周评论》。1919 年 5 月，他受张澜之聘，和李大钊、瞿秋白一起担任《晨报》编务，在《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是年冬天，又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下，在北京组织了轰动全国的“工读互助团”，探索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光祈先生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五四运动，亲自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群众游行，而且当天下午就将游行情况用专电发回成都。此后，他共向成都发出了 50 多篇通讯和文章，报道五四运动发展的情况，从而使五四烈火得以在四川全境熊熊燃烧。王光祈先生的同学、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曾经写道：“北京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这线光明，这就不能不功归于王光祈了。”

光祈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还是一名著名的音乐学家。他自 1923 年改习音乐以后，为了创造一种“能够表现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使一般民众听了之后立志向上”的音乐，他一方面潜心研究欧洲特别是德国音乐发展的历史、现状和音乐科学，另一方面系统研究了中国音乐历史上各个专题，在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比较音乐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异乎常人的卓绝成就。光祈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音乐学家，中国和东方“比较音乐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不愧是温江人民引以自豪的乐坛泰斗。

光祈先生英年早逝，但他的英名却与世长存，受到了故乡人民的永远怀念，他一生奋斗不止、探索真理、献身社会、热爱祖国的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为了继承和发扬王光祈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特编辑出版这本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 110 周年的专辑，以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进一步提高温江的知名度，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为促进温江新跨越而努力奋斗。

是为序。

二〇〇二年九月

目　　录

王光祈生平综述

韩立文 毕 兴

王光祈是我国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一位社会活动家，也是我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至三十年代中期具有卓越贡献的一位著名音乐学家。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因劳累过度，病逝波恩。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几乎被人遗忘，有时甚至受到不公允的评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终于开始得到社会文化界应有的重视。

“同学中的佼佼者”

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四川温江人。1892年8月15日（农历）出生于温江西郊的鱼凫镇小河村。祖父王再咸，字泽山，清朝咸丰壬子科举人。曾作过后来相继出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赵尔丰两兄弟的受业老师。父亲王展松，系本县秀才，经营铸锅业，在王光祈出生前两月不幸客死旅次。王光祈出生时，家境衰落，依靠孀母帮人缝补浆洗和叔伯们的不时接济，勉强度日。

王光祈的母亲罗氏，出身书香门第，知文能诗。从王光祈呀呀学语起，其母就教他背诵诗词。1901年，罗

氏卖掉家里仅有的几亩园林和院落，送光祈到附近一所私塾读书。塾师蒋春帆是一位维新志士，常向学生讲述戊戌六君子的故事。川人刘光第、杨锐慷慨就义的事迹，在童年时代王光祈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7年，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赵念及王再咸教诲之恩，将王光祈母子接到成都相见，并从当商罚款中，指拨纹银一千两，存入两家大商号生息，供他们母子生活。也由于这一偶然的机缘，王光祈在这一年才得以离开温江就读于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一年后，王光祈考入了成都有名的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与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嗣銮、曾琦等先后同班。这是一所旧制五年制中学，当时的"一代名流"如刘士志、王铭新、杨沧白、刘咸荣等都先后在该校任教。他们热心提倡新学，鼓吹"排满兴汉"，倡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在良师的栽培下，王光祈学习努力，思想活跃，成绩名列前茅。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书中，称他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1911年6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王光祈卷入了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洪流，参加了罢课和游行的行列。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兴奋、激动，剪掉了吊在自己头上的辫子，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不久，成都兵变，商号遭劫，王光祈赖以生活的"息银"断绝了，他在衣食交困中，挣扎到中学毕业。1913年春，通过种种关系，他挤进成都一家无聊的报馆，靠编稿谋生。国家前途、民族灾难和个人出路交织在一起，他思想极度苦

闷，常和李劼人在茶铺闷坐无言，相对叹息。由于他不愿“随波逐流地鬼混”，不久，便挟起包裹，弃职回家，闭门研究诗词和经史，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飞舟出夔门

1914 年春，王光祈抱着“要彻底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的志向，在亲友的资助下，出川谋求深造。由于经济困难，他只好搭乘小木船，在风浪中颠簸东下。船过三峡，他触景生情，吟咏成《夔州杂诗》六首，描述了故乡人民的苦难。倾吐了自己心中的不平。表示了“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的正气和决心。当他辗转到达上海吴淞车站时，他的朋友几乎不敢相信。魏嗣銮回忆见面时的情景说：“他一身破旧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是他仅有行当。布鞋后跟烂得象鱼尾巴一样拖起了。”①不久，他在赵尔巽的帮助下，到北京清史馆任书记员。是年秋，考入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寓居北池子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其后，他在《新青年》民主、科学旗帜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新文化的宣传活动。1916 年秋，经周太玄引荐，他到《京华日报》做兼职编辑，结识了久已仰慕的正在主编《晨钟报》副刊的李大钊，多次交往，十分投契。在李大钊的鼓励和帮助下，王光祈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决心为“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②而斗争。

在五四激流中

1918年7月，王光祈以优异的成绩（第二名）毕业于中国大学。是年12月，他参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创刊号上的发刊辞和社论，分别由陈独秀和王光祈执笔撰写。在该刊上，王光祈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山东的强盗行径；揭露巴黎和会高唱和平是一张“不兑现的支票”；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强权。这些思想对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在《晨报》副刊上，连续撰文，宣称“二十世纪是劳动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人都要劳动”；世界上最不平的就是“田主、资本家终日快活”，“劳动者替他们做奴隶，做牛马”；提出“劳动者应当要求自己的权利”，要实行“生产机关公有”，教育平等，要求青年献身“为公众谋利益的事业”。这些企图改造社会的思想，在当时也都是难能可贵的。他还参加了邓中夏、许德珩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任小组书记，做过《什么是善》和《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等演讲。

这段时间，他不仅在北京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他的影响也波及到成都。1916年，王光祈应四川《群报》主笔李劼人之约，兼任该报驻京记者，每天向成都寄剪报、发新闻，介绍北京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积极从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张勋复辟的斗争。后来《群报》被封，他又担任《川报》的驻京记者。1919年

春，北京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广大爱国青年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动向，群情激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王光祈不断地将北京的消息发回成都，并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国际形势，抨击中国政局，文笔犀利，富有煽动性，给偏僻的四川，投进了一线光明。5月4日，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王光祈亲自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行列。当天晚上，他满怀激情地写了长篇通信，介绍了北京如火如荼的斗争。这篇通信在5月17日的《川报》刊登后，“真无异在成都投下了一颗大的爆炸弹”。[③]当天早晨，成都高等师范的学生，正在用膳，四川学生联合会主要负责人袁诗荛，大步跨上饭桌，慷慨激昂地朗读王光祈的北京通信，“登时全校如同火山爆发，食堂变成了会场”，[④]一致通过拍发专电，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声讨北京卖国政府，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就在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展开了。

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

五四运动后，全国出现了许多革命社团，王光祈和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它编辑出版的《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在当时思想界、文化界具有相当影响。“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经过了一个酝酿的过程。1917年前后，王光祈和周太玄同在一个报馆工作，他们经常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深感“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决心“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

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5]。”他们设想，要有一个不单在学问方面还要在事业方面共同奋斗的团体。他们把这种想法，以书信的方式和在东京留学的陈淯、曾琦等进行讨论。并多次和李大钊倾心交谈，得到李的全力支持。

1918年5至6月，我国留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先后有三千余人罢学归国。雷宝菁、张尚龄、曾琦等陆续到达北京。由于多次书信往还，彼此早已心会神交。经过几次商讨后，王光祈初步提出了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的设想，并草拟了规约大纲数十条。在讨论过程中，曾琦主张学会应以马志尼为楷模，建立一个“少年意大利”式的党。王光祈坚决反对，他认为十九世纪之少年意大利，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之意大利而已。吾人所创造的是适合廿世纪之少年中国。最后决定由王光祈起草《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

1918年6月30日，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会。列名发起人为陈淯、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雷宝菁、王光祈等七人。公推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太玄为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译部主任。委托王光祈起草学会规约，与李大钊商榷一切。筹备期间，预定为1年。

王光祈为学会起草的规约共70条。规定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

俭朴”。他说：“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⑥

筹备会后，王光祈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会务。编辑图书数种，发行会务报告4期，发展会员42人。

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回回营陈愚生宅邸，举行了“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王光祈被选为执行部主任，主持学会工作。这个学会一直存在了6年多时间，先后加入学会的有120余人。毛泽东、赵世炎、恽代英、张闻天都是经由王光祈介绍加入该会的早期会员。

乌托邦幻想的破灭

王光祈在创立“少年中国学会”时，还没有成熟的政治主张。只是笼统地提出：“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国’，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⑦其后，他吸收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及其无政府主义；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通过自己的主观臆想，绘制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他理想的少年中国蓝图是：在离城不远的乡下，租一个不大不小的菜园。大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每日种菜两小时，读书三小时，译书三小时。王

光祈把他幻想的这种桃花源式的乡村乐园，作为他理想社会的雏形，热诚地号召大家实行这种“神圣的生活”。[8]

1919 年 12 月 4 日，他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提议组织一种“男女生活互助社”(即工读互助团)，帮助青年“脱离家庭压迫，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养成互助劳动习惯，创造读书的机会。”文章发表后，他即四处奔走，终于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名流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的支持下，筹措了一笔经费，他亲自草拟简章，编制预算，租房子，制家具。不到半个月，“工读互助团”首先在北京问世了。报名参加的有数百人，由于条件限制，只吸收了三十余人，成立了三个组。王光祈幻想通过“工读互助团”，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9]的崇高理想。他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平和的经济革命”。

“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武昌、南京、天津等地相继仿效实行。1920 年 2 月，毛泽东在北京参观了女子“工读互助团”，“觉得很有趣味”，曾致函周士钊，提议创办自修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他说：“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虽然名噪一时，但由于在经济上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团员们的思想又极不一致，特别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想法是根本行不通

的。因之，在1920年3月之后，陆续地自行解体。这时，王光祈十分痛苦，决心远涉重洋，留学考察。他表示“若果学无所成，愿到太平洋与鱼虾作伴”，永远不再与国人见面了。

为探寻真理出国留学

王光祈为了解德国战败后如何复兴社会经济，为拯救中国学习新的知识，探寻真理和经验，决心赴德留学。1920年4月，他与魏时珍一道，乘法国邮船离沪赴欧。临行前，王光祈与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约定，担任驻德特约通讯员。海上航行约40日，船抵马赛，他们转道巴黎，会见“少年中国学会”诸友后，于6月初抵达德国西部的法兰克福。王光祈在去国途中，曾写《去国辞》五章，以陶情砺志。辞中提到：“欲洗污浊之乾坤，只有满腔之热血”，“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唯我少年，努力努力！”王光祈为“复兴中华”坚守“少年中国学会”“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精神和信条。他初到德国，加紧补习德文，攻读政治经济，并利用晚上时间与魏时珍一起浏览德国各大报纸，择其重要的有价值的新闻、消息，由魏时珍口译，王光祈笔录整理成文，分寄回国。同时，他还为国内各期刊杂志撰稿。此后，王光祈完全靠稿费收人维持生活。王光祈寄回的特约通讯稿，向国内同胞广泛介绍了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以及艺术活动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帮助国内人士开

阔视野，了解世界，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慨然有志于中国音乐之业

王光祈由攻读政治经济转而研习音乐理论，这是他在赴德三年之后的事。出国前夕，他热衷的“工读互助团”解体了，不久，“少年中国学会”也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向左中右急速分化。王光祈痛心地看到，他所倡导和支持的社会改良活动接连遭到失败，他为没有找到改造中国的真正出路而内疚，深感“忽忽半年，毫无建树，清夜思之，汗如雨下。加之一年以来无暇读书，思想破产，直欲赴郊外放声痛哭一场。”因此，他急欲出国寻找出路，想求得一种较有系统的学问，以学术的奋斗来创造“少年中国”。

王光祈初到这个音乐之邦，深受音乐之风的熏陶和感染，实地看到了国民“以至非有音乐不能生活的境地”[11]这对他的影响颇大。王光祈出身于没落世家，自幼崇尚儒家学说，在家乡时也会吹箫弄笛，喜欢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但主要是传统的礼乐观在他思想上扎根较深。他十分崇拜孔子，自称是“孔子的信徒”。[12]他在1923年10月的《申报》撰写的第一篇音乐通讯《德国音乐与中国》一文的开始就指出：“吾国孔子学说，完全建筑在礼乐之上”。他从其传统的礼乐观出发，认为立国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之‘民族性’”，而礼乐又与中华民族之精神有密切的关系。“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因此，当他看到欧洲物质文明破产的情况，转而

想到要改造中国，复兴中华，必须从精神文明着手，即必先行改造人心。而改造人心，就必须从恢复礼乐开始。所以，王光祈怀着炽烈的热情提出："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13]。"正是如此，他才"慨然有志于中国音乐之业"。具有坚强个性的王光祈，并未因其在社会活动中的重大挫折和个人感情生活上的失意而稍减自己的事业心和对于祖国的眷恋深情。他慨然从事音乐学的研究，就是要"以音乐再造中华民族"。他从其爱国心出发，幻想通过音乐，唤起民众，以实现"少年中国"之理想。

1922 年，王光祈开始利用工读之余学习小提琴。一年以后，他决意放弃政治经济这一社会学的研究，怀着礼乐可以兴邦的思想，开始转到柏林一所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钢琴和音乐理论。此后，王光祈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事音乐学的研究和著述。1927 年考入柏林大学以前的短短 4 年中，他已经在国内发表出版了《德国人之音乐生活》（通讯十篇）、《欧洲音乐进化论》、《东西乐制之研究》等 12 种有关音乐的著述，开始显露出他在音乐学研究方面的才能，使一些过去反对他改习音乐的友人感到意外和惊讶，同时也引起了当时国内音乐界的注目。

孤苦奋斗的学术生涯

王光祈进入柏林大学后，以音乐学作为主课攻读达

7个学期之外，先后师从霍恩博斯特尔、舍尔林、沃尔林等教授。学习课程有音乐理论、钢琴、音响学、乐器学等。后来，又在柏林乐器博物馆长萨克斯教授班上学了3个学期的乐器学，并到乐器博物馆实习达一年半之久。为了更好地掌握人体听觉、发声器官的构造，他还师从柏林国家医院耳科主任“研究耳朵、喉管解剖之学”。由于刻苦钻研，用力至勤，王光祈在音乐学研究上，特别在音乐史学方面获得了较高的造诣和成就。他在德国从事音乐研究总共13年，其论著竟达34种。另外还编译了《国防丛书》5种，《近代外交史料》7种，撰写了数百篇通讯文稿。

王光祈身处异国，在中国音乐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他仍积极整理、研究和总结祖国音乐文化。他为了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曾指出：“现在学中国的日本人，尚知道保存几分‘中国音乐’的本来面目，而中国人自身反把‘中国音乐’认为一钱不值，不肯细心去研究，这真是我们从事音乐的同志所当引为深耻的。”[14]他在国外看到西洋“汉学家”对我国学术界的轻视态度十分气愤。渴望中国学术界同志奋发有为，“能一洗此种奇耻大辱！”王光祈潜心于音乐研究的最高理想和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引起民族自觉之心”的具有“民族性”的“伟大国乐”。而且这种国乐，是要建筑在我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他认为这两种东西是我们的“民族之声”。还说：“余既主张‘音乐作品’是含有‘民族性’的，非如其它学术可以尽量

来自西洋，必须吾人自行创造。”如何创造呢？他认为：音乐艺术决不可以象引进其它科学技术那样照搬西洋的一套，决不能“以西乐代疱”，更不能依靠那些“黄面黑发”的“洋音乐家”，而必须自己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王光祈在德国克服了种种困难，“先用全力，从事零碎工作”，然后不遗余力地埋头于有关中国音乐史的整理和研究，为1931年成书的《中国音乐史》作了充分准备。他凭着一股子民族志气，投入大量精力，对音乐遗产进行整理，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以促进“国乐”的建立，创造出具有民族性的新音乐。这种新音乐能够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并使其“跻于国际乐界而无愧”。

王光祈一生艰苦备尝。他在德国勤工俭学16年，不靠官方或私人的分文资助，完全以卖文为主。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尽管德国城市风光绮丽，名胜古迹甚多，他却很少进城游览。他总是去工人食堂用餐，每餐只吃一菜。即使偶有好友请他去餐馆用膳，也坚不肯往。他勤奋写作，治学严谨。主张研究任何学问，都要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而且“不惜以毕生之精力从事”。因此，他往往为了研究一个问题，查阅一条资料，翻译一个名词或几首古谱而在图书馆耗费数月心血。由于生活长期无人关照，工作过于刻苦，他患上胃病或头痛症。每当发病时，仍以“左手抚头，右手作字，直至痛楚无力时，工作始废”。曾数次昏倒于波恩图书馆中。他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说：“余留德十余年，皆系卖文为

活，自食其力，即本书一点成绩，亦系十年来孤苦奋斗之结果……”。即使在这种“孤苦奋斗”的情况下，他仍抱着为做学术，虽弄得“焦头烂额死而无悔”。

以译著事业报效祖国

王光祈虽然经历坎坷，但并非消极遁世之人，蕴藏在他内心的对祖国的爱是深沉而炽烈的。“九一八”事变后，王光祈主动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活动。当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时，他正因胃溃疡和贫血卧病柏林医院，闻此噩耗，“百感交集”，“寝食难安”。他因远在异国，无能为力，却竭诚“希望国人能从各方面积极准备，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努力”[15]。王光祈带病坚持写了不少揭露日本侵略野心的文章，陆续发表在国内和德国的一些报刊上。在文章中，他热烈歌颂战斗在抗日前线的东北义勇军，提出：“东北义勇军与日军血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使日本暴军，疲于奔命，不能安枕。表现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决心和牲牺精神。”[16]由于王光祈痛感强敌压境、国难当头，而自己远处异城，鞭长莫及，于是主动致函上海中华书局编辑舒新城，提出编译一套《国防丛书》，在国内出版，以直接为抗战服务。他在1932年4月编译成的《空防要览》一书序言中说：“余本以研究音乐为终身职业，但鉴于此次沪变被敌蹂躏，而自身远处异国，不能稍尽抵御之责，至以为愧。乃发愤收集西洋国防材料，于课余之暇，从事译述，以备国 人参考。”可知其用心之良苦矣！

1934 年 2 月 15 日，一日本教授来波恩大学拟作《满洲国与日本》的侵华讲演，并携带有关纪录影片，于讲演后公开放映。王光祈立即组织留德同学愤起阻止这次讲演。由于希特勒上台后的 德国正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搭，当然不会支持中国学生的抗议。于是他只好组织同学写出抗议书，请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在日本教授讲演之前，说明中国学生反对这一事件的经过情况，并宣读中国学生的抗议书。然后，中国学生退出会场。事后，他还写信给其他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预作准备，以防止同样的反华活动出现。王光祈身处异邦，处处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与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

1935 年，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中国华北进犯，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经“少年中国学会”的友人推荐，蒋介石曾致电柏林大使馆，转询王光祈有无归国之意。原电有“闻王君光祈绩学苦行，不胜钦佩：如愿归国，当图借重”等语。王光祈因不肯勉强苟合，故以已应波恩大学继聘，不便中途解约为由，继续留在德国。

荣获博士学位

王光祈抱着“音乐救国”的目的，从事音乐理论研究，范围极广。他从 1923 年转习音乐开始，通过著译编选有关著作，比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音乐科学和各国的音乐发展情况以及与作曲有关的理论。这方

面的著述有：《德国人之音乐生活》、《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西洋乐器提要》、《各国国歌评述》、《对谱音乐》、《音学》、《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名曲解说》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音乐知识十分贫乏和眼界相当闭塞的二、三十年代的国内青年来说，具有启蒙意义，促进了对西欧音乐文化的学习和了解。特别是他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著作中，向国内介绍了二十年代在德国也属于新兴学科的"比较音乐学"，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起到了开拓和奠基的作用。

从 1926 年起，王光祈开始注意将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介绍于西方。他先后在德国发表或出版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文章和专著有《音乐在中国的意义》、《论中国音乐》、《论中国记谱法》、《论中国诗学》、《论中国古典歌剧》、《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中国的道白戏剧和音乐戏剧》等 7 篇。另外，他还在 1929 年《英国百科全书》、《意大利百科全书》重新修订时，担任了有关中国音乐条目的撰写。1934 年，王光祈以《论中国古典歌剧》的论文，荣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第一位音乐学家，也是我国最早获得世界承认和肯定的音乐学家。他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以及在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比较音乐学上所作出的众多著述和贡献，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病逝波恩　魂归故国

王光祈一生刻苦自砺，生活清贫，长期营养不足，又过度勤奋于研究著述，不上 40 岁时，他的头发已稀疏露顶，身体开始衰弱了。1936 年 1 月 12 日终因脑溢血不幸骤逝于莱茵河畔的波恩医院，年仅 44 岁。

王光祈逝世后，波恩大学立即以校长毕脱罗斯基名义向全校发出讣告。同时，波恩大学外国留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启。1 月 18 日下午举行了追悼会。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教授卡勒博士说："他在研究院无时不以最大的努力和确定的态度来工作。他是一个很静默稳重的人，只有很接近的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还说："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应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前驱者。"波恩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希德玛博士说："因他率直和蔼的本质，以及纯粹的性情，取得了许多师友们的信仰和同情。……他把握住了西欧、特别是德国方面研究音乐的科学方法与途径，由此设法与故乡的音乐与戏剧的艺术相接近，这居然给他做到了！他已是一位受有严格教育的音乐学家。"

王光祈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内，"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们及他的生前友好，先后在南京、上海和成都举行了追悼会。3 月 15 日在南京举行的追悼会有田汉、徐悲鸿等知名人士参加，会场遗像为徐悲鸿所作。追悼会由

宗白华主祭。蔡元培在悼词中说：当时到德国去研究音乐的留学生不多，他只认识王光祈与萧友梅。“萧先生注重音乐的技术，而以学校为传播的机关”。“王先生注重史实，而以著作为传播工具”。他痛惜王光祈竟“在壮年去世，不克进展所长，公认为全国的大损失。”上海的追悼会于同日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大礼堂举行，由舒新城主祭。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代表该校送的挽联是：“旷代仰宗师，著述等身，寿世更留音乐史；穷年攻律吕，栖迟异地，夜台长伴贝多芬。”（波恩系贝多芬故乡，贝多芬青年时代曾就学于波恩大学）原定萧友梅博士讲演，后因病体不适，改由该院教授黄自代表致词。黄自在讲话中除了将王光祈对于音乐的贡献作扼要的介绍外，还特别强调其“所著《中国音乐史》及对于普及音乐之努力，为最有不可磨灭之价值”。成都的追悼会于4月19日在南郊成公中学举行。由周太玄、魏时珍、李劼人等介绍王光祈的生平事迹与“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之始末。“少中”会友孟寿椿作了题为《五四运动时代王光祈先生的奋斗生活》的讲演，他说：“王光祈先生是我生平最敬佩的一位畏友，他有天才，有热心，有毅力。他是文学家、音乐家、社会改良运动家。他生平毫无凭藉，只是赤手空拳，仗着一支秃笔，满腔热情，抱无畏的精神，不妥协的态度，去不断的与社会上一切恶魔奋斗。所以，他的一生，便是一部苦斗史，里面充满长期的和短期的战绩！”

王光祈的骨灰于1938年经过沈怡辗转运回成都。

1941年冬，在著名作家李劼人的主持下，将骨灰埋葬于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侧。墓上覆盖一块镌刻着周太玄楷书的“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的大青石碑。在十年动乱中，这块典雅、朴实的墓碑，竟被弃置于野草丛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块墓碑才被找回，迁置于四川音乐学院校园内。为了永久的纪念，修建了“王光祈碑亭”。横匾由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题写；两旁楹联为“革命先驱，少年中国；蜚声寰宇，音乐名家”，系四川前辈、老革命教育家张秀熟所题。

王光祈短暂的一生，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的一生。

王光祈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功绩是卓著的，他永远值得后人尊严和纪念。

〔注〕

①《访问魏时珍谈话记录》，1982年。

②李大钊：《青春》，载《新青年》2卷1号。

③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载《川西日报》，1950年5月4日。

④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⑤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⑥周太玄：《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⑦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⑧王光祈：《与左舜生书》，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⑨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载《晨报》，1919年12月4日。

⑩王光祈：《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载《少年中国》，1卷8期。

⑪王光祈：《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

⑫王光祈：《论中国古典歌剧》，附录（一）我的简历。

⑬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

⑭王光祈：《各国国歌评述》

⑮王光祈：《东北问题与国际形势》，载《生活周刊》，1932年。

⑯王光祈：《国防问题》，载《生活周刊》，1932年。

（本文作者均为四川音乐学院教授）

王光祈温江故乡生活志略

戴尧天

十九世纪初，北京爆发了一场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在这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运动中，曾经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揭开了我国近代历史上反帝反封建的新篇章。王光祈正是当时这批人物中相当活跃的一位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1918年），他即在北京与李大钊、周太玄、曾琦、雷宝菁等人发起创立“少年中国学会”，提倡“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五四运动发生时，他立即投身运动之中并迅速将运动详情写成长篇通讯寄到成都，从而使五四烈火得以在四川全境熊熊燃烧。不久，他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名流的支持下，联名组织“工读互助团”，力图实践其“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后来的旅居德国的16年中，他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抱着“音乐救国”的强烈愿望，以坚定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专攻音乐理论和音乐史，以《昆曲研究》(或译为《中国古代歌剧研究》）论文，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被聘任教于该校东方学院。在其出国前后，曾先后担任过成都《群报》、《川报》、北京《京华日报》、

《晨报》，上海《申报》，以及《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著名报刊的编辑和特约通讯员，发表了不少颇具影响的评论和通讯。生平著述甚多，包括音乐专著和其它著作在内，总计不下40种，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尽管一直生活在贫困艰苦、道路坎坷的环境中，却始终坚忍不拔，顽强奋斗，光明磊落，气度恢宏，无论在治学与为人方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他一生的事业和成就，国内外已有许多报道和评价，可是对他早年在温江故乡的生活情况则很少谈及，实为憾事。自光祈出生至离开故乡，共历21年，在此期间，他度过了童年、少年和一段青年时代，其间他的家庭环境、社会遭遇以及所受到的各种教育和熏陶，无疑地都会同他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在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以便进一步研究其政治和学术思想，我们作为他的故乡人民，自应义不容辞地把它介绍出来，并以此表达我们故乡人民对他所寄予的深切怀念。

一、家世梗概

王光祈，字润玙，亦字若愚，出生于1892年10月5日（农历8月15日），出生地点在温江县城西郊约三华里的锅厂附近（现温江区柳城镇永宁村）。其祖籍原在湖南，大约于清代乾隆时，在所居地方和相邻的崇庆县属元通场两处开设锅厂，经过一番艰难的创业，积蓄了一笔财产，开始过着小康生活。他的高祖王宏信始因

经商入川，定籍温江。从那个时候起到王光祈一代，他家在温江共历五世。王宏信颇善经商，熟悉铸锅业。到他曾祖父王谦光时转而习文，成为华阳县的“诸生”，从此开始了他家世代的读书家风。王谦光生有一子一女，女嫁本县举人赵熙光为妻，子名王再咸，即光祈的祖父。

王再咸，字泽山，自幼读书，聪颖好学，博闻强记，才思敏捷。清代咸丰二年乡试中举，后到北京参加礼部考试，不料落榜，于是愤然放弃举业，留居北京以诗酒自娱。为人性格豪放不羁，诗文写得很好，往往倾刻立就，是当时京中的一位“名士”，曾任八旗子弟的教师。后出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赵尔丰弟兄均出自他的门下。生平好谈天下大事，尤喜谈论兵法，“隐然有用世之志”（民国十年《温江县志》卷九·人物）。曾游历大江南北，所到之处常留心观察当地风土民情和军事险要形势。两江总督曾国藩、山东巡抚丁宝桢曾慕其名，礼聘他为幕宾。清同治辛未年（1871），病逝于北京，后归葬于温江，著有《泽山诗钞》二卷，刊行于世。

光祈的父亲名展松，字茂生，或字梦生。也是从小读书，为本县秀才。曾赴北京在清内阁任职。为时不久即回到家乡经营锅厂，由于他的书生气较重，缺乏经商经验，因此所营锅厂没有多久便出现亏蚀，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不将锅厂出租给别人，而他自己则外出从事小本经商，就在光祈出生的那一年（1892年）不幸

病死于隆昌旅次。死后两月余，始生光祈。故光祈是他的遗腹子。

光祈出生后，家境已很萧条，连同出租的锅厂和一所住宅在内，全部家产总值不过三百两银子，而固定收入则只有每年二十几千文钱的锅厂租金，这点微薄的收入，实难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为此，他的母亲只好撑持着孱弱的身体为人浆洗缝补，勉强度日。

二、孤苦童年

光祈幼年丧父，依靠寡母生活，而家庭经济又十分困难，可以说他整个的童年过得既孤又苦。所幸其母贤淑，对光祈倾注了无限的母爱，把他照顾得颇为周到。

他的母亲原本出身“书香门弟”，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知文能诗，非常注意对光祈的教育，几乎从光祈呀呀学语起，她便试着教他识字念诗，以后渐次形成习惯。在光祈 9 岁以前，都一直是由他的母亲教读。光祈学得很认真，记忆力也很好，往往每经教读便能琅琅上口，经久不忘。其母还不时向他讲述其祖辈特别是王再咸的事迹，期望他以后能继承家风，发扬光大。一次，其母戏出“以天下为己任”一联，他居然脱口而出地对以“视富贵如浮云”。对仗虽欠工稳，但格调高雅，应对敏捷。无怪他的母亲高兴地夸奖他说：“你真不愧是乃祖王再咸的后代”。

家庭生计的困难，母亲的含辛茹苦，促使光祈过早地“懂事”。为了尽量减轻家庭负担，这个生长在农村

的孩子，八、九岁时便为附近农家牧牛，每当晨光熹微和夕阳西下的时候，他骑牛缓行在杨柳河边，一面吹箫弄笛，一面默诵诗文，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优美景色，让自己幼小的心灵完全陶醉在这一派诗情画意之中。

当他 9 岁时，其母不忍他因家贫失学，所以将仅有的几亩林园和一所四合院瓦房卖掉，迁居到县城西门外麻市街，并送他到相距不远的三官庙侧（今温江柳城镇庆丰街小学对门）一所私塾上学。塾师蒋春帆是一位颇有学识而又思想激进的人，对戊戌变法极为推崇，经常向学生讲述维新六君子的故事，这在童年时代王光祈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蒋春帆老师出“观今鉴古”一联，命塾中年龄较大的学生接对下联，不料光祈竟出乎意外地要求也让他参与，塾师感到很惊奇，同意让他试一试，当其他学生还凝神构思的时候，他已经站起来用满口童音高声对出“除旧布新”的下联，塾师甚为满意，接着又出“运筹国策”一联专门考验他，他又很快对以“还我河山”。从这两次属对的联语中，已经看出了光祈童年所孕育的胸襟和抱负。蒋春帆老师后来对人说：“王光祈幼有大志，将来必定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

在蒋春帆所教的那所私塾读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转到县城内社学巷杨根培的家塾中附读，直至 13 岁。这所家塾的塾师叫黄玉珊，也是一位善于诲人的饱学之士，他在那里受到的教益颇多，进步很快，常常为塾中的师友所称道。

三、成都求学

在光祈 13 岁* 时，恰值他祖父王再咸当年的学生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赵尔巽因念及旧日师生情谊，通过查访，得知光祈母子生活拮据情况，便立即派轿将他母子接到成都。临行时，光祈从其好友崔干臣处要来他祖父所著的《泽山诗钞》一部，作为见赵时的礼物。赵接见他们后，坚嘱光祈到成都求学。同时从成都 48 家当铺的罚款中拨出一千两银子，存入成都东、西门两家最大的典当商铺生息，每年计有息银四十余两，全数交与光祈家使用。由于得到赵尔巽资助的这一偶然机遇，光祈即于 13 岁那年（1905），以同等学历进入成都胡雨岚所办的第一小学堂高年级读书，从此开始了在成都的求学生涯。

1908 年，光祈从小学毕业，庚即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这是一所五年制的旧制中学。校长刘士志（字行道）是一位热心教育、提倡新学的汉学家，除负责学校行政工作外，还亲自教授历史课程。他教课时斟今酌古，内容丰富，讲得有声有色，引起了全校学生学习历史的浓厚兴趣。他常常教导学生要薄于自奉，勇于治学，而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些都给学生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时在该校任教的大多数教员如杨沧白、刘豫波、徐子林、祝念鹤、朱青长、王又

---

* 编者注：光祈 13 岁是 1905 年，赵尔巽 1905 年出任盛京将军，1907 年改充湖广总督，不久，调任四川总督。因之，光祈 13 岁到成都读书不确，应为 1907 年。

新、廖学章等，都是当时的名流，因此这所学校那时是全川教学质量最高的一所中学。

赵尔巽未调离四川以前，一直关心光祈的学习，对他的要求很严，规定他每周要作一篇文章送去，由赵亲自为他批改。同时还特地替他报捐了一个“同知”的前程，尽管他和赵的关系如此密切，但他从不在人前炫耀，就连对他最知心的同学也是讳莫如深。在校期间，他始终保持着贫苦学生的本来面目，头上拖着一条拇指粗的发辫，身上穿着老式的长衫短褂，脚上穿着一双往往偏大的靴鞋，可是神态上却是目光炯炯，朝气蓬勃，诚恳朴素，潇洒方大，使人一见便有可亲可敬之感。由于他的文字基础比较牢靠，加之不断勤奋学习，因此每学期总是名列前茅。他和曾琦以及后从乐山转学来的郭沫若都同是他们班上的高材生。他读书喜欢朗诵，声调铿锵，抑扬顿挫，摇头晃脑旁若无人，课余常独坐一隅，仰屋凝神，构思做诗。他对班上一些纨绔子弟，往往不屑为伍，常有意和他们疏远。因此，有人暗地里称他为“怪人”，其实他的这种“冷僻”只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对那些真正读书、立志成材的同学，则是推心置腹，热情相交。在同班同学中，他与李劼人、魏时珍等 12 位同学一起到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周太玄家里聚会，大家竟仿效“桃园结义”的故事相约死后同葬该地，大有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之意。后来他在德国逝世，李劼人等即设法将其骨灰安葬在这里，大

概就是因为当年曾经有此一约。*

光祈童年已学会吹奏箫笛一类的乐器，在自然的天籁中，已陶冶出对音乐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兴趣更是与日俱增。在中学求学期间，他非常醉心于川剧，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逐步掌握了川剧的各种乐器和唱腔。每到周末，他便兴致勃勃地邀约一批爱好川剧的同学到曾琦家中坐唱，紧锣密鼓，胡琴高腔，每至深夜才尽欢而散。当时成都风气比较闭塞，守旧势力还相当顽固。他们的校长刘士志虽然竭力提倡新学，但校内以学监都敬斋（清代廪生，绰号“都喇叭”）为代表的守旧派仍然奉行着封建传统的教育方法。光祈对此大为反感，时发怨言，他对学校所设置的那些禁锢思想、旨在复旧的课程和管理方法，极其蔑视，往往采取随便应付的办法，加以消极抵制。事为都敬斋所知，竟在一个学期开学时，以“桀傲不驯”为由，挂牌不准他和另一同学魏时珍住校。尽管后来通过说情，允许他们继续住校，但他们对都敬斋那种顽固粗暴的作风行为仍然十分不满，认为纯系出自都敬斋的有意刁难。

1910年，正当光祈上中学三年级时，他的母亲渴望他结婚，以便及早传宗接代。经过一番选择，终于在当年初春为其作主娶温江镇子乡人罗次玙（亦名罗次姗）为妻。罗的年龄较光祈小一岁，曾受过新旧两式教育，很会刺绣，也能操持家务。他们婚后感情尚好，当年即

* 编者注：据了解李劼人沙河堡菱角堰的住宅，系抗日时期构筑，本段情节，尚需核实。

生一个男孩，可惜只有数月即告夭折。翌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成都发生兵变，赵尔巽原为他家存银生息的两家当铺被抢倒闭，以致他家的生活重陷困境。可是光祈并没有因此消沉下来，相反却以高昂的热情，积极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和同学们一起去听四川咨议局副局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关于保路问题的讲演，高唱《保路歌》，参加罢课。辛亥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他便立刻剪去头上那条象征清皇朝封建统治的发辫，表示对辛亥革命的衷心拥护。这时他的心目中，关于个人和家庭的得失已经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而深深吸引着他的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这场巨大的变革以后，他的性格反而变得更加开朗豪放，脸上常露笑容，简直看不出有丝毫穷愁潦倒的悲伤情绪。在极端困窘的生活中，他咬紧牙关，坚持学习，终于在1912年顺利地完成了中学学业。

四、离乡以前

光祈中学毕业后，曾一度到重庆与郭步陶、曾愚公、宋小宋等人编辑《民国新报》，意图一展抱负，但因种种条件的限制，使他很难施展，思想上感到很无聊，苦闷之余，常与报社同人做诗消遣。曾作清明词30首，可惜大多散失。报馆的待遇很低，每月所得仅能糊口。不久报纸停办，他便回到温江，在家乡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1914年春始离乡赴京。

在他回到温江的头一年（1911年），由于城关米珠

薪桂，所费较大，为了节约开支，家已迁居乡下，住在从前宅基附近的几间草屋中，家产荡然，已经到了赤贫的地步。他回到温江以后即与家人同住在那几间破陋不堪的草房里，靠着他的妻子做一些针线活计和亲友的一点帮助，过着三餐难继的生活。更为使他伤痛的是他的母亲由于长期操劳忧瘁，久病卧床，在这一年去世，家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二人和一个两岁多的女孩。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他在家里亲自操持家务，烧饭做菜。并常到好友崔干臣所教的私塾代课。尽管生活如此困窘，但他并没有丝毫放弃学习。他常常是一面烧饭，一面读书。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认真学习了许多古代经史和名家诗集，只是所读的诗就有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吴梅村、龚定庵、张香涛等人的传集。通过这段时间的潜心学习，使他在古代文学的修养方面扎下了更加牢靠的根基。

他回温后，喜欢同一些风华正茂而又具有一定学识的人交朋友，当时与他时相往还的有何学章（字拔渠）、姚公甫、赵君凯、杨根培、许孟余、崔干臣、文耕九、彭云生（崇庆县人）、曾远侯等人，其中与赵君凯、崔干臣、彭云生最为莫逆。他们常常相聚唱和，研读《天演论》，纵谈时务。在这些场合中，光祈最为活跃。富有辩才，他的言论往往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所作的诗格律谨严，咏味隽永，常为同游的朋友们所赞赏。曾远侯在寄给许孟余的诗中曾有："润玙旧相识，遣辞潘陆

美”的句子，来赞美光祈。那时温江有一位著名学者曾学传（字习之），在县城设帐授徒，提倡程（颐、颢）、朱（熹）及王阳明理学，光祈很不以为然，认为程、朱等人的理学多涉虚妄，不切实用，无补于人类社会的改造，而对戴东原的学说则颇为服膺，认为戴东原的不少论点远在传统理学之上。并把这些见解向朋辈传播，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旧时代温江的社会情况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不仅风气闭塞落后，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出自个人的利害得失，尔虞我诈，虚伪相待。最初一些人看到光祈家道中落，孤儿寡母苦撑度日的光景，便尽量疏远，避之唯恐不及。及至看到光祈与四川总督赵尔巽有深厚的关系，既有赵在经济上的资助，又有“同知”前程，他们便一改原态，转而大肆奉承，争先恐后地前来巴结。有的主动上门问寒问暖，赠银馈物；有的改称呼，叫他“少爷”。后来看到他家一贫如洗，而光祈又一时没有出路，便又都冷眼相看，不予理睬，有的甚至还要加以冷嘲热讽，光祈对此感触甚深，使他改变旧社会的决心更加坚定。为了给那些趋炎附势朝云暮雨的人以适当的教训，他常常采取一些寓庄于谐的巧妙方式来回击。一次，他和友人文耕九等相约往游县境内的名刹东宫寺，一个浑名叫做“郭九娃”的人，依仗其叔父是本县哥老头子，盛气凌人地强要同游，席间大家请光祈赋诗，郭九娃竟出言不逊，当面嘲笑光祈，于是他立即口占一诗嘲郭：“抢吃堪称郭九娃，眼如圆镜箸如叉。常将一筷

拈三片，惯用双拳隔两家。饮尽瓮头余白甑，舔干盘子现青花，酩酊醉罢翩翩去，斜依栏干掏板牙。”惹得众人哄堂大笑，郭九娃满面羞惭，只好狼狈而去。

现实的生活促使光祈充分认识到对于旧的社会“必须彻底的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周太玄《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同时也认识到要达到这一目的，决不能久留乡土，守株待兔。他十分向往其祖父王再咸当年遍历全国各地的壮游。几经考虑，决定到北京深造。他以坚强而自信的口吻对好友崔干臣说：“我必须要到外面去，再不能在温江呆下去了”。1914 年春，他毅然离开故乡，经泸州辗转赴京。离家时身边所带旅费只有二千文钱，折合大洋不过一元半，这对一般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于想象的。启程时，他脚穿草鞋，背上简单行囊，内装一部《杜工部全集》，他的妻子牵着不满三岁的女孩（不久因患天花死去）送他到温江东门外的长安桥，这里是温江去成都的必经之地，店铺林立，颇见繁华。因为拿不出更多的钱，他们不敢进饭馆，只在沿街的一家豆粉摊上，各人喝了一碗豆粉便算作饯行。他喝完豆粉，告别了妻儿，迈着坚定步伐，离开故乡，走向漫长而又崎岖的征途。

王光祈先生生平事略

刘伯高

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1892年10月5日（农历8月15日）诞生于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永宁村。光祈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王再咸（泽山）为清末京中名士，诗人。父名展松，字梦生，县中秀才，1892年客死于隆昌旅次，死后两月余，始生光祈。他在少年时代，勤奋治学，胸怀大志。早年在成都高等小学就读。继又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同学中有郭沫若、李劼人、魏时珍、周太玄、曾琦及同乡何学章等，皆一时俊彦。1912年，毕业于成都府中。时值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常去听保路演讲，唱《保路歌》，参加罢课。辛亥革命刚刚胜利，立即剪掉发辫，表示与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决裂和对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向往与拥护。

求索京华

1914年春，他毅然告别家乡，乘船东下，过夔门时赋诗，抒发出“直行终有路，何必计荣枯”的勇气和决心。他先到上海，后赴青岛，然后复至上海去北京，寻求升学上进与革命之路。当年秋，考入北京读中国大学时，积极参加了北京地区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

斗争。并且以四川《群报》驻京记者身份，在京拍发专电揭露袁世凯、张勋的丑恶活动，对四川的倒袁、反张勋复辟斗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五四运动前的 1917 年，王光祈和周太玄在《京华日报》工作，他们经常一起谈理想，说抱负，深感“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绝望，把这个老大腐朽，呻吟绝望，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年少年，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这种想法，以书信方式和东京留学的陈淯、曾琦等交换意见进行讨论。并多次和李大钊倾心交谈，得到李大钊的全力支持。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过程，1918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会，列名发起人陈淯、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雷宝菁、王光祈等七人。公推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会计和起草员，周太玄为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辑部主任。王光祈在起草文件中说：“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西开辟一新纪元”，起草公约共 70 条。规定学会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学会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经过筹备，1919 年 7 月 1 日，在北京回回营陈愚生宅，举行了“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先后参加学会的会员有 122 人。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张闻天都是通过王光祈直接参加该会的早期会员。会员中尚有邓中夏、高君宇、张申府、刘仁静、杨贤江、黄日葵、沈泽民、侯绍裘等，后

来都由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共产党党员。会员中的曾琦、李璜、陈启天、余家菊、何鲁等发展成为国家主义派，组织了中国青年党。会员中的许德衍、周太玄、李劼人、宗白华、朱自清、周炳琳、田汉、郑伯奇、舒新城、卢作孚等，则超然于党派之上，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或从事教育、实业，做一些有益于国家的事情。会员周佛海是国民党的要员，后来沦为汉奸。由于会员思想分歧，影响会务开展，在1925年停止活动。在2001年7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时，有媒体认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进步团体纷纷涌现，少年中国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思想与组织基础"。

1919年7月，王光祈吸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思想，创造了他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他先提出建立新农村思想，由于这一方案难于实行，他又主张在城市组织工读互助团，幻想实现"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支持下，在北京、上海、武汉、济南、四川等地办起了工读互助团。1920年2月，毛泽东和王光祈曾在上海会晤，策划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委员会，毛泽东深表赞同，他说："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后来，各地工读互助团因遇到经济上的困难，生活难以维持，产生思想上的混乱，以致无法克服，宣布解散。显然，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正是中国的先进革命分子，探索中国革

命道路的实践，也是我国民主革命走向进步的一个阶梯。可见王光祈先生满怀爱国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和追求，为五四运动作出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先导。

1919 年 5 月 4 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王光祈先生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宣传鼓动家。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有份量的评论文章，如《国际社会主义改造》、《国际革命》、《今日之梅特涅》、《兑现》等文章，对五四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亲自参加五月四日的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及火烧赵家楼的活动。当天晚上，他满怀激情地写了长篇通讯，介绍了北京如火如荼的斗争电稿，及时发回成都。5 月 7 日，这篇通讯在《川报》上发表，“真是无异在成都投放了一颗大的爆炸弹”。成都高等师范学生正在用膳，四川学生联合会主要负责人袁诗荛，大步跨上饭桌，高声朗读王的通讯，当时全校师生把食堂变成会场，一致通过拍专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燃遍了巴山蜀水。继后，他每天从北京向成都拍专电、寄剪报、写通讯共有 50 多篇。文章痛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对鼓励全川人民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光祈先生参加五四运动的实际斗争，充分显示出他追求革命真理，正从民主革命走向新民主革命道路的坚强步伐。

王光祈先生不仅对中国革命有无限的追求，还致力

于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史学，对中西音乐学等学术有精深的研究，特别是他自介入社会起一直对新闻事业非常执着。1913 年，他去重庆与曾琦、郭步陶、宋小宋等编辑《民国新报》后，回到成都又在一家报社任主笔。1914 年经李劼人介绍担任四川《群报》驻京记者。他及时将北京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消息和文章发回成都，对四川的反袁倒张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1916 年，他受友人周太玄之邀参加《京华日报》编辑工作。1917 年春，《京华日报》停刊，继随周去《中华新报》工作。1918 年，四川《群报》被查封，李劼人主办《川报》，又应聘为驻京记者。他每周至少写通讯两篇，还寄出剪报和发专电报导北京信息。他的通讯文笔犀利，敢于抨击时政，揭露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无不精辟透彻。当时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王光祈是主要撰稿人之一，王著《国际社会之改造》系创刊号社论。继在《时事新报》、《新青年》、《北京晨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如社论《国际革命》、《工作与人生》、《劳动者的权力》、《社会主义派别》等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五四运动时期，王光祈不断将北京的消息发回成都，正如张秀熟老人在学术讨论会上说："成都知道五四运动情况，消息得的很快，我们对于王光祈先生就更加敬佩了"。1919 年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王的新闻作品更加增多。当年发表在《每周评论》有 6 篇，《晨报》10 篇，《新青年》1 篇，《时事新报》1 篇，《少年中国》22 篇。1920 年 4 月，王以北京《晨报》、上海

《申报》、《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身份赴欧留学考察，在留德16年中，向《申报》寄发的各种稿件达140多篇。还有不少文章，在《少年中国》、《时事新报》、《醒狮》、《中国教育界》、《晨报》、《教育与民众》、《生活民刊》、《新中华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他还用德文在德国的《法兰福克报》、《文化报》、《德累斯顿报》发表了一些专论文章，光祈先生身处20世纪的旧中国，满怀爱国主义思想，敢于时代先，以新闻记者的健笔，抨击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腐败，不断介绍新思想和新文化，写出了很多有时代强音的新闻作品，对启发全国人民革命斗志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站在新闻工作的前线，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口诛笔伐，以大无畏的精神写出了很多通讯、报导文章，震撼了当时社会，对中国革命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他处在军阀箝制舆论、新闻报导手段落后的旧中国，敢于鼓足勇气，信心百倍的为民喉舌，为民前锋，为新闻事业终身执着的精神，真是民国报界的先锋。

留学德国

1920年初夏，王光祈先生辞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职务，计划赴欧、美留学。其目的：“（一）联络世界各地华侨之优秀青年；（二）筹备华盛顿通讯；（三）个人求学问题”。在决计去欧洲时，慷慨写出《去国辞》，表明他的抱负和心志。其中名句有：“发挥科学之精神，努力社会事业”，“不依过去人物，不用已成势

力”，“欲洗污浊之乾坤，只有满腔之热血”等发人深省的爱国热忱和对新时代的希望。1920 年 6 月到达德国直到 1927 年春，先后在法兰福克、达尔模城、莱比锡等城市进行考察，写出一些音乐著作。1927 年 4 月，正式进入柏林大学音乐系深造，攻读达 7 个学期。1934 年 2 月，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荣获波恩大学哲学（音乐学）博士学位。光祈先生去德国改习音乐，对中西音乐史、音乐美学、比较音乐学都有精深造诣。自 1924 年起，写出音乐书籍 18 种，如：《中国音乐史》、《论中国古典歌剧》、《音学》、《欧洲音乐进化论》等都是很有价值的音乐著作。还有音乐论文《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中国乐制发微》等 10 多篇专论，独具见解，使人百读不厌。另有其他著作《少年中国运动》、《王光祈旅德存稿》、《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以及国防丛书等 19 种也深受读者欢迎。后来，波恩大学校长毕脱罗斯对王光祈在学术上的成就与沟通东西文化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名垂后世

1936 年 1 月 12 日午后 8 时，王光祈因患脑溢血症，病逝于波恩医院。波恩大学校长毕脱罗斯向全校教职员发出讣告。18 日举行追悼会，对王光祈作了高度的评价。2 月 28 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出了《王光祈先生的哀耗》谓：“王光祈为吾国唯一的音乐史学家，平生著作甚富，治事亦极精炼，不幸骤于上月在德逝世——

噩耗传来，国内学术界咸为震惊——同深悼惜。”3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举行追悼会，由蔡元培主持，徐悲鸿手绘光祈先生遗像。德国大使陶德曼的代表到会致词说：“王博士不仅是一个学者，并且也是一个沟通中德文化的重要人物”。同日，上海也举行了追悼会，舒新城致词说：“王君留德十六年——坚苦卓绝之伟大精神，洵足为现代青年之表率”。4月19日，四川成都举行追悼，参加的人有李劼人、周太玄、刘大杰、魏时珍等人。8月15日，温江县各界举行追悼会。会后并将王光祈名位列入在原温泉公园内的乡贤祠奉祀。其遗骸在波恩火化后，骨灰于10月运回上海。1941年由王光祈先生好友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等将王光祈骨灰安葬于成都沙河堡李劼人住宅“菱窠”附近墓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两次委托陈毅副总理来川视察之便，探询光祈一生动向和有无遗属情况。可见毛泽东和王光祈在“五四”时期的深交厚谊。1983年10月，四川音乐学院在院内建立了“王光祈碑亭”，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亲笔题写“王光祈碑亭”的横匾，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张秀熟撰写了“革命先驱，少年中国；蜚声寰宇，音乐名家”的联文。1984年6月22日至27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四川音乐学院、温江县政协等六个单位，共同举办“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辽宁、西安、广州、南京、福建、贵州、天津、昆明、

成都等地音乐界、史学界的学者专家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共七十余人，写出论文36余篇，与会者一致认定王光祈先生是一位爱国主义的著作家、社会活动家、卓越的音乐学家。会议还编辑了《王光祈研究论文集》和《王光祈音乐论文选》。1992年9月11日，成都市人大、市政协、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音乐家协会、四川音乐学院和温江县共同主办了王光祈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11日上午举行开幕式，由市人大副主任冯如秀致开幕词，吕骥、冯光钰、邱仲彭、李忠勇等同志分别代表主办单位作了重要讲话。会上，四川大学黎永泰教授宣读了论文《王光祈先生与毛泽东的关系略述》。下午，全体与会代表专车到王光祈故乡的温江公园内，出席了由中共温江县委、人大、政府、政协举办的王光祈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原温江县委书记李建明致词，原县人大副主任戴尧天作了《王光祈先生在温江故乡青少年时代》专题介绍。80高龄的吕骥同志即席讲话，热情深刻，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会后并参观了王光祈先生纪念馆书画展。次日，在四川音乐学院学术厅进行了学术交流，大会共收到论文19篇。在纪念会上，与会代表肯定认为王光祈先生是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近现代史上的音乐史学家。会后，编辑出版了《黄钟流韵集》。

王光祈先生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的一生。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斗争、倒袁反张斗争、五四运动斗争，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成为民主革命的先驱和五四时期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他为民国报界的新闻事业也起到先锋作用。他为中西音乐的学术交流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是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音乐学家、音乐史学家，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的楷模人物。笔者参阅了有关王光祈先生的一些资料，写就《王光祈先生生平事略》以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110周年。

王光祈与毛泽东的交往略述

黎永泰

王光祈先生是五四时期一位爱国的、充满美好理想、向往正义和新社会，倡导民主与科学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他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那个时代走在社会潮流前头的革命家们，有着密切联系和深厚的友谊，在探索中国社会出路中，他们经历了一段共同的道路。虽然王光祈先生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到底，但是这一时期，他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结下的深厚友谊却传为历史佳话，成为王光祈先生历史上值得大大纪念的一页。

（一）王光祈介绍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王光祈和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最大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1918年7月，王光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后经李大钊推荐，在《京华日报》作编辑并担任《四川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我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王光祈由于新闻业务关系，大量接触十月革命消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很大的热情和兴趣。在这之前，由于他和李大钊

的密切接触，受到李大钊激进思想的影响，对社会黑暗现实产生了强烈不满。他和李大钊、周太玄等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弊，探讨改革中国社会的办法。他们决心要唤起青年，“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①]他和李大钊商量，准备成立一个团体来具体进行改造中国的工作。1918 年 6 月 30 日，王光祈和李大钊开始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就在这时，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和王光祈，并直接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活动。

1918 年 8 月 19 日，毛泽东为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由长沙动身到北京。到京后，经在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毛泽东原在湖南长沙一师的尊敬师长杨昌济的介绍认识李大钊，并由李大钊把这个早就仰慕他的学生安排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新落成的第一院（沙滩红楼）第 31 号室负责管理报纸，并登记前来阅览报纸的读者姓名。他同时参加了 北大哲学学会和新闻学会，使他有了广泛接触社会各色人等的机会。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无产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斗争风起云涌，潮流直接激荡中国。青年学生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来阅报的人很多，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他们。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广泛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学会活动，结识了一些学者和新闻界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时候，毛泽东认识了作为新闻记

者的王光祈。李大钊和王光祈正在物色“少年中国学会”的同志，毛泽东怀抱“经纶天下”的大志，立志要改造中国，因此对王光祈主张的“以满腔的热血，洗污浊之乾坤，愿我青春之中华，永不老大”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深为赞成，他很快和王光祈建立了密切关系，成为挚友，并欣然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活动。

关于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时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说：“1919年底或1920年初，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毛泽东曾参加过这个学会。”该书的根据，可能是依据1920年2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第1卷第8期刊载的一条消息：

新加会员，本会于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其人名、通讯处如下：

姓名	行号	年龄	籍贯	通讯处	在本会何科
张闻天	闻天	二十	江苏	上海西门黄家阙	文科
芮学会	道一	十九	山西	东京府下千太谷四九一	文科
毛泽东	润之	二六	湖南	长沙马王堆修业学校	文科

如果依据这条消息，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时间是1919年底或1920年初，应当是准确无疑的。但是，根据有关材料全面分析，我以为，这只是毛泽东在有介绍人的情况下正式履行入会手续的时间，但实际参加学会的时间应该还要早一年左右。毛泽东在参加少年学会筹备活动时，就实际上被算作了学会的会友。

1936年12月，李璜在《我所认识的王光祈》一文

中回忆，毛泽东 1918 年秋冬，已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他回忆说：“我认识光祈，是在民国七年秋冬之间。……我到北平之第三日，李大钊会友约往米市胡同便宜坊吃烧鸭，座中有陈愚生、易克嶷、邓仲懈会友等。光祈来较迟。酒食正酣畅，两会友忽觅来，一赵世炎，一毛泽东，光祈为介绍，言：‘两友有意赴法求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我注赵、毛两会友，皆较年青于是时之我辈，光祈也以小弟弟待之，与语时更多笑容。”②这个回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参与其活动的，都算会员，会员之间大家以会友相称。二是毛泽东当时确与王光祈有密切联系，赴法勤工俭学均与王光祈有商量。王光祈也积极联络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活动。他称赵世炎、毛泽东为会友，说明毛泽东此时已实际上算作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例如，王光祈把 1918 年 12 月 14 日在日本东京病逝的雷宝菁称之为“少年中国学会最忠实的会员”。李璜 1919 年初赴法国巴黎，也是在筹备期间参加过短期活动的，也算为当然会员。③

既然毛泽东 1918 年秋冬在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时，就成为学会的实际会员，那么又怎样解释《少年中国》月刊上所载毛泽东 1919 年底或 1920 年初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那条消息呢？根据《少年中国学会规约》第二章会员第四条指出：“凡中华民国之有志青年，由本会会员五人介绍，经评议部认可，得为本学会会员。”王光祈对这一条的具体执行办法作了如下解释：“本会

对于会员资格限制极严。凡加入本会者，须有会员五人介绍，经评议部认可。评议部成立，再为请求追认，方能取得会员资格。"④根据这个规定，毛泽东是应当补办手续，"请求追认"的。但在学会正式成立时，他已离京回湖南，不可能再补办手续。1919年12月7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从长沙出发，12月18日到达北京，直到第二年4月11日离京去上海，这是他第二次在北京期间。从有关材料看，他和王光祈、李大钊仍有密切接触。这时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已近半年，毛泽东到京由王光祈等五人介绍，补办了正式入会手续，这样才有上面所登"新入会员"的消息。因此，这条消息所登的时间，应当只是毛泽东正式补办手续入会的时间，而不是实际入会的时间。即使这样，毛泽东的入会手续仍没有完全，以后他还补填了入会志愿表。1921年9月29日，毛泽东在《致杨钟键》的信中说："钟键先生，前几天接到通告，知先生当选执行部主任。今日又接来示，嘱补填入会愿书，今已照填并粘附小照奉上，惟介绍人系王君光祈为我邀集五人，我现在只能记得三人，余二人要问王君才能知道。"⑤据少年中国学会最早的会员，1992年仙逝的97岁高龄的原四川大学数学系教授魏时珍先生向作者回忆，学会筹备期间，凡参加活动并有志于此的，均作会员看待，最初并无什么繁琐手续。

上述情况说明，1918年秋冬，毛泽东与王光祈之间已有密切联系，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共同目标下，他们联络同志作团体的运动，以改造中国为目标，成了志同道

合的挚友。毛泽东在 1918 年秋冬实际参加了学会，而正式履行手续入会是 1919 年底或 1920 年春，填写入会志愿书则在 1921 年下半年。弄清上述事实，对于我们了解王光祈和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活动和思想发展有很大帮助。

（二）王光祈和毛泽东开展的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王光祈在少年中国学会中从事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发起进行创造新生活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这种实践活动也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使他这一段时间的思想和实践受到了王光祈的影响。

王光祈作为新闻记者，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下，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说："自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直接行动以来，这布尔什维克也就成了中国的新闻记者、政治家、教育家所注意的一个问题。""我本来是研究外交的，因欲研究外交，故极留意世界大势，因留意世界大事，不知不觉的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了。"⑥王光祈对社会主义表示热烈向往，但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看待俄国革命，对劳农专政的社会主义很不理解。他力图寻找一条既与俄国社会主义性质不同，又能实现美好社会的新生活的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互助论和工读主义等等，便被他看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宣传实行起来。少年中国学会便成了他实验社会主义的最好场所。

1919 年，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王光祈着手成立工

读互助团。他幻想用“工读互助”，“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向恶社会宣战”。[7]他把中国社会的教育不良和所谓缺乏劳动互助的习惯，当成社会最大的弊病，企图通过工读互助，一方面培养青年“独立生活”的能力，使他们摆脱家庭和社会的压迫，有可能“自由读书”，并且“踊跃前来，与黑暗势力奋斗”；另一方面，培养青年具有新社会“互助劳动的习惯”，“共同的生活观念”，扩张人们的“利他心”，为实现大同社会作一个预备功夫。王光祈“奔走筹画”，吁请名人赞助。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都帮助募捐和撰文宣传，所以不到一个月居然组织成功，并被视为“破天荒的创举”，引起社会舆论很大注意。一时报名参加王光祈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有“数百人之多”、“各地来函探询讨论的有数百封。”

毛泽东对工读互助活动深感兴趣。早在他第一次上北京之前，1918年6月，他和蔡和森、陈昌等人，便曾在岳麓山搞过新村实验，虽然不几天便归于失败。但是他并不灰心，又积极筹划组织一个“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工读同志会”，来实现建设新社会的理想。1918年7月末，他把自己的打算写信告诉北京的蔡和森。8月21日，蔡和森回信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8]1918年秋，毛泽东到北京结识王光祈以后，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王光祈组织工读互助团和新村的计划，与毛泽东的想法很相符合，此时李大钊也受到这

种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对他们的计划极表赞成。因此，王光祈和毛泽东对搞工读互助团和新村都充满了信心。

五四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发表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等三篇论文。这些论文对互助论和工读主义的宣传，使文章具有较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毛泽东将报纸每期都迅速地寄往北京各友人处。毛泽东在当时的信函中也记载了将《湘江评论》寄往北京的情况。1919 年 9 月 5 日，他在与黎锦熙的信中说："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五号，被禁刊停，第五号寄来尊处，谅已接到。"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是互相通信的。[9]王光祈是毛泽东的挚友，又是新闻记者和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毛泽东肯定也将《湘江评论》寄给他。王光祈作为《川报》驻京通讯记者，他每日有向《川报》寄一束北京剪报的任务，很有可能经王光祈之手，把毛泽东寄来《湘江评论》，再转寄回在成都主办《星期日》的李劼人。这样，在《湘江评论》查封之后，1919 年 11 月 16 日——12 月 3 日，在成都《星期日》第 19 号至 21 号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三篇论文，在成都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

1919 年 12 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此时，由王光祈和少年中国学会倡导的工读互助团刚刚成立。毛泽东一面加紧组织湖南代表和学生进行驱张斗争，组织平民通讯社，印发宣传材料，一面抽出时间密切关心和注

视已经成立的三个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情况。他还抽出时间，亲自到北大去参观和考察工读互助团的活动。1920年2月，毛泽东从北京写信给陶毅，报告北大工读互助团的情况说："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以说已经失败了）。"[10]毛泽东很想回湖南以后，由新民学会仿照少年中国学会的工读互助团，在湖南组织这样的团体来创造新生活新社会。3月14日，他写信给长沙的周士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2）投稿。（论文稿和新闻稿）（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主。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或者邹泮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周士钊对毛泽东的建议极表赞成，敦促他早日回湘着手进行。他指出："麓山自修社，现今大有可为，即兄前曾建议之新民学校，此时似亦可着手，因为易先生现已回湘也。"此时，无论是王光祈、毛泽东，还是他的朋友们，都对工读互助组织充满了希望。

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组织的三个工读互助团，尽管并不是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它追求新生活的精神，对旧社会却是一个威胁，因此很快失败。王光祈不承认在旧制度下这种和平的、典型示范的道路根本行不通，而把失败归结为“全是人的问题”。[11]1920 年 2 月，王光祈到上海。29 日，他和陈独秀、彭璜等 20 余人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并通知在北京的毛泽东。毛泽东深表赞成。他说：“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12]

3 月 5 日，上海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宣布这是“一种新生活组织”，它将“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13]毛泽东虽然因驱张事宜尚未结束，不能离开北京，但他仍和王光祈、陈独秀、彭璜等 20 余人列名为上海工读互助团正式成员。毛泽东在驱张事宜暂告一个段落后，立即去上海。《少年中国》杂志报告他和王光祈的行踪说：“王君若愚（即王光祈——引者注），陈君剑翛、魏君时珍，均于四月一日自上海出发，前往欧洲。毛君润之于四月十一日自京南下往沪，张君声甫因丁内艰回籍。”[14] 毛泽东自北京出发，游历山东曲阜等，25 天后于 5 月 5 日到达上海。

其时，王光祈等还没有离沪到法，毛泽东与王光祈过从甚密。毛泽东住在安南路仁厚里 99 号，继续进行驱张活动的宣传和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毛泽东具体担任洗衣服和送报工作。但上海工读互助团和北京三个工读互助团一样，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下，根本不可能有

立足之地，很快也就失败了。6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写信给在北京的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停止。"

此时，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计有会员12人在沪，少年中国学会在沪会友人数较多。两会进行了密切交往，并于5月初在一起开过两次会议，都是在上海半淞园举行的。新民学会会员劳君展详细回忆了会议情况。张国基回忆了毛泽东、王光祈出席会议的情况。张国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欢送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志和去南洋群岛的一批教员，并藉以联络新民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的感情，借法租界霞飞路松社，举办联欢会。到会的约七、八十人。新民学会到会的有毛泽东、彭璜、李思安、张国基、陈纯粹、欧阳泽等；少年中国学会到会的我认识的有康白情、王光祈、魏嗣銮、涂开与、左舜生等。毛泽东和康白情各代表自己的学会讲了话，会场是设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上，围坐成一个圆圈，还照了一张十二寸的大照片作纪念。[15]据魏时珍先生向笔者回忆：王光祈、毛泽东、陈独秀等还在商务印书馆里见过面，一起吃过饭，那时他们关系极好，最为融合。之后，王光祈、魏时珍等人，便乘船赴法。7月8日，毛泽东也离沪回到长沙。

如果说，王光祈此时还没有放弃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他要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寻求他的理想，那么此时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放弃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他从上海回到湖南之后，立即发动了湖南自治运

动。湖南自治运动的设想，也和王光祈有关。

毛泽东关于自治运动的设想，早在 1918—1919 年期间，就受到了王光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思想的深刻影响。1919 年毛泽东第一次上北京期间，他除了和北大学生朱谦之讨论用无政府主义改造中国的种种办法外，还和王光祈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办法。王光祈鉴于国际联盟强权主义的危害，主张以平民的自治团体加以对抗。他认为，未来的国际社会，是由各个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起来的。为了实现国际社会的改造，不能首先从国家的改造做起，而必须从地方自治做起。“譬如在直隶省的地方，组织一个直隶自治团体，这个自治团体，系由我们工人自相联络，组织起来的。所有经济上的一切支配，皆归我们自行纲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毫不假手于诈欺取财的资本家与那邪恶滔天的政府。我所说的工人，不管他是用脑力的、用体力的、或是直接有益于人的或是间接有益于人的，只要他在这直隶省内工作，不问他是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朝鲜人都算直隶自治团体的一员。”[16]毛泽东完全赞成他这个主张，他和王光祈在政治上的一致，使他们结成了亲密的关系。

陈独秀、李大钊在这个问题上也和王光祈持如斯主张。陈独秀在 1919 年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认为：“大规模的民治制度，必须建立在小组织的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实现，基础不坚固的建筑，象那沙上层楼，自然容易崩坏。”“只有这种小组织……乃是政治经济彻底改造的出路。”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他看到：

“中国自从改造共和以来，南北冲突总是不止”，中国处在分裂之中。他错误地把这种分裂现象和“人民对国家要求解放”、“殖民地对本国要求解放”等情况混淆起来，认为这都是必然现象，因此不必在“统一”上去下功夫，“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一个新中国。”[17]办法就是如瑞士、德国、美国那样，先邦后联，在造成独立国的基础上联合。陈独秀、李大钊提出的改革中国社会方案，反映了他们还没有完全了解西方经验，以及和改良主义彻底决裂时的思想状况。

毛泽东第二次上北京时，他和李大钊、王光祈继续讨论改造中国的问题，到上海后又专门和陈独秀讨论关于组织“湖南改造同盟”的计划，并与王光祈有所讨论，他完全接受王光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政治主张。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若干文章，一再阐明和他们相同的观点。由于自治运动没有摆脱改良主义和空想的成分，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自治运动于 1920 年 10 月 10 日后归于失败。从此，他走上了与王光祈不同的道路，把自己一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为在中国实现独立解放、繁荣富强和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事业。1925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填词》中，对“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的问题回答说：“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

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在回答“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从毛泽东对调查表的填词中看，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王光祈等人的主张，已相去甚远了。

但是，毛泽东是一个极其尊重历史的人。但虽然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实际活动时间并不长，与王光祈的交往时间也不长，但是他极其珍惜这段历史。对于五四时期有过贡献的王光祈先生，也给予了应有的地位和重视。据王光祈的老朋友，1920 年 5 月与王光祈同赴欧洲的魏时珍先生回忆：“毛泽东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很想延揽光祈，共襄国家建设，而光祈远在德国久绝音讯，何从探询！一次陈毅元帅回成都，在宴会上，遇见李劼人副市长，陈毅向劼人说：‘我回成都，向主席告别时，他向我说：你们四川省有个王光祈，你知道吗？我答：不知道。主席又说：那么，你到成都时，可以问一问，是否有人知道。’劼人把王光祈在德国波恩逝世的情况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回北京后又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又指示陈毅打听王光祈在四川是否还有遗属，要予以照顾。”[13]所有这些，体现了一个伟大的历

史唯物主义者对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王光祈的关怀和评价，表现了毛泽东对待这段历史的辩证态度。

〔注释〕

①《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71页。

②《王光祈纪念册》第33页。

③参看《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会员通讯”。

④《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221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0页。

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

⑦《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

⑧《新民学会资料》第16页。

⑨《李伯刚回忆》，武汉市文管处1969年2月10日访问李伯刚记录之一。

⑩《新民学会资料》第62页。

⑪《为什么不能实现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第7卷第5号。

⑫《新民学会资料》第62页。

⑬《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申报》1920年3月5日。

⑭《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第57页。

⑮《新民学会资料》第560页。

⑯《国际社会的改造》,《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第1期。

⑰《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

⑱四川大学哲学系学生刘平:《魏时珍先生访问记》1984年3月。

(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光祈与“五四”时期的四川革命斗争

王迪先

王光祈是四川温江人，生于1892年。1908年，他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时，努力学习新思想，初步树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1911年，他积极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胜利感到十分高兴。1914年至1918年，他在北京读大学时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的斗争。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发动者之一；是全国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主要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对于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五四时期，王光祈很关心四川革命斗争，特别是通过他的老同学、当时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四川群报》和后来的《川报》的负责人之一李劼人的关系，对四川成都地区的革命斗争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王光祈与四川的反袁、反张勋复辟的斗争

1914年秋，王光祈考入北京的中国大学。1916年秋，他应周太玄之约，参加北京《京华日报》工作。同时，经李劼人推荐，兼作《四川群报》驻京通讯记者，

每天向成都寄剪报一束，拍新闻电报几十个字。（当时只有有线电报，新闻电报取费高，内地地方报纸资本都不大，每天能有二、三十字的北京或上海的专电，已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在这段时期，国内政治舞台上发生了风云巨变。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全国开展了倒袁和反张勋复辟的斗争。王光祈积极参加北京地区的反袁世凯称帝和反张勋复辟的斗争，并且对四川的倒袁和反张勋复辟斗争的开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李劼人说：驻北京记者王光祈“所写的反袁世凯帝制和反张勋复辟的消息和文章又快又多而又有力。”①例如张勋复辟还在准备阶段，王光祈就从北京拍专电和写消息到成都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根据 1916 年 9 月 16 日《四川群报》的记载：“本社北京特派员专电十三省督军电劾张跃曾与某督军。”即：《四川群报》驻北京记者王光祈专电成都说，张勋等十三省督军电劾新国会成员张跃曾等，从而，揭露了张勋等妄图以武力干涉政治，阴谋复辟的借口。同天，该报还登载了他从北京寄回的消息两则，一是揭露张勋之伪装。即“张勋因近日外间传其结合十三省同盟之说，极不自安，日前有电辩白。……以解中央之惑。”另一是揭露张勋继续秘密捣鬼。即“外表停顿”，“内愈觉猛烈”，“秘密协商”，其中重要成员“梁士贻、张镇芬、夏秦田等会议后署名为众志成城团，名目上为拥护中央实际仍必行其同盟事件，以×巩固彼等之利益”。梁等“到津寓居于德租界张勋之花园内，迭经讨论此

事，倘此团告成，武人跋扈中央之实权尽失去之”。9月22日至24日，《四川群报》披露北京消息三则。一是《张勋干涉议会之又一电》。二是《张勋干涉国会之又一电》。三是揭露张勋干涉国会的反响和危害，即：“张少轩竟以此通电攻击国会，张作霖、赵倜亦附和发言，曾无丝毫尊重爱护立法机关之意，军人骄蹇如是，诚可为宪政前途不胜危惧者矣。”

9月25日《四川群报》登载：“本社特派员电冯国璋劝告张勋”。

9月29日《四川群报》登载王光祈从北京寄回消息《王宗尧请宣示二张情事》。明确指出：“张勋攻击新国务员中司法总长张跃曾，而政府与议员均连带侮辱”。“王宗尧奋起致电总统，责备张勋代表大多数国民”，指出“张勋军借题发挥，无理取闹，公然以毁法自任”。

王光祈从北京拍专电和寄回新闻揭露张勋复辟阴谋，对于四川反对张勋的斗争和反对武人干涉政治的斗争起了重要的影响。如在这段时期《四川群报》先后发表多次有关时评，揭露张勋复辟阴谋和斥责武人干涉政治。如9月16日《四川群报》登载时评《武人干涉政治》指出：“张勋等十三省督军联电弹劾张跃曾与烟土案有关，是否有问题，国家自有主裁之，不容拥有兵权者联电干涉也，实袁派与非袁派相倾，袁死其余毒犹未尽去也，武人干涉政治皆袁氏所养成。”9月28日《四川群报》时评三联系四川实际指出：“谋去戴氏*，不当

* 戴氏指当时中央政府任命的四川省省长戴戡。

出之非法定之机关，不当出以破坏安宁秩序之手段，不当蹈武人干涉政治之嫌，不当过损中央之威信，使张勋辈愈无法约束耳!”

1917 年 7 月张勋拥溥仪复辟。王光祈更积极的从北京发回反对张勋复辟的专电和全国反对张勋复辟的各种消息，对四川的反张勋复辟斗争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王光祈与五四运动在四川

王光祈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宣传鼓动者之一。五四运动时，他在《每周评论》发表过许多文章，其中《国际社会之改造》、《国际革命》、《今日之梅特涅》、《兑现》等文，热情欢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揭露巴黎和会的欺骗性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本质，尖锐地指出巴黎和会中鼓吹剿灭革命的人是今日之梅特涅，明确指出中国面临着国内革命和国际革命的任务。我们应先进行国际革命。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专门针对山东问题写了《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一文，从法理与事实出发坚决反对青岛由德国交给日本，并表示“中国政府虽麻木不仁，中国青年尚可以‘背城借一’”。他的这些文章对于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18年，《四川群报》被反动军阀封闭。不久，由昌福印刷公司的樊孔周约请李劼人等又创办了《川报》，由李劼人任总编辑和发行人。李依然聘请王光祈为驻京通讯记者。作为五四运动直接参加者和宣传鼓动者的王

光祈，在作《川报》北京通讯记者工作中，对五四运动的宣传特别积极。他每天从北京向成都拍专电（每天专电由二、三十几字增加到50多字，有时还用一个字代替一句话的办法表达更多的意思）、寄剪报和写通讯。有时甚至一天连发两三封信报导运动发展情况。他在"五四"前后，先后从北京发回成都五十多篇通讯。《川报》几乎每天、至少是两天便有他的鼓动性最强的通讯。文章分析国际形势，痛论中国政局，议论清新中肯，切中时弊，鼓舞了群众。

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亲自参加了这一运动，即日将五四运动的消息专电成都，于5月7日最先在四川《川报》上刊登出来。接着，他将亲自参加和看到火烧赵家楼的情况，用一支"挟有感情"的笔写出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的长篇通讯寄回成都。5月16日，王光祈在五四夜晚写的长篇通讯到达成都，李劼人等满怀激情地在文章前后写了富有鼓动性的按语"并在通讯前后做了很多含有刺激性的标题，把五四运动更加渲染得有声有色，这样一来，王光祈关于'五四'的通讯，在成都许多人——尤其是在前进的含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圈子中，真无异是投下一颗大的炸弹"![②]17日晨，成都高师的学生们正在早膳，有人登上饭桌，高声朗读王光祈的北京通讯，顿时似乎火山爆发了，群众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会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自此就在成都开展了。地处边陲的成都能成为全国五四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地方之一；《川报》能及时报导"五四"消息，推动这一运

动；原因很多，王光祈的努力，是原因之一。正如李劼人回忆说："北京五四运动之所以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③

五四运动期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留日学生归国代表刘泗英等回到重庆，参加川东学生救国团和学生联合会的工作，提出争回青岛、惩办国贼、取消不平等的密约、抵制日货等口号。为了交流外地学生运动经验，更好开展重庆学生运动，刘泗英写信给王光祈谈重庆学生运动情况，要求王光祈给予支持。王光祈及时向重庆的刘泗英寄《少年中国》刊物和写信传播了新思想。

王光祈与成都的《星期日》

在五四运动前，由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筹备成立全国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1919 年 6 月 15 日，在全国"少年中国学会"尚未成立之前（按：全国"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时间是 7 月 1 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就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以能够很快成立，是与王光祈的帮助分不开的。由于他对五四运动在成都的开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成都一部分倾向进步的人，对他更加欢迎和更加信服。五四运动后不久，王光祈与曾琦联名写信给李劼人说："他们在北京发起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宗旨是本科学之精神，作社会之活动"，约李参加该会，并在成都发展会员。在王的邀约下，李劼人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在

短短半月内，介绍志趣相投者 9 人入会，得到北京总会同意。由于少年中国学会成都会员离北京太远，通信都要十六、七天，经王光祈和总会同意准予成立成都分会。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后，以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的北京总会，立即函告成都分会祝贺说：“北京同人闻分会成立极慰望积极进行”。总之，少年中国成都分会的成立，是在王光祈邀约李劼人参加学会和发展会员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1919 年 7 月，在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在成都创办了《星期日》周报。这个刊物是一个“尖锐地批判旧制度，热烈地传播新思潮”的刊物。这个刊物是“五四”后，四川成都创办的第一个宣传新思潮的刊物，也是当时全国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刊物之一。这个刊物从 1919 年 7 月创刊到 1920 年 4 月停刊，共出了 36 期．对于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对于四川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成都的《星期日》周刊能够办起来，并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是与光祈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王光祈是北京《每周评论》的发起人和主要撰稿者。④他热情地向李劼人等介绍了《每周评论》的特点，认为它能密切跟随形势发展，用进步观点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尖锐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性战斗性是当时任何资产阶级报刊所不及的，也为刊期校长的

《新青年》所不及。同时，建议在成都办一类似的刊物。然后，经少年中国成都分会会友讨论决定，创办了《星期日》。正如李劼人说：由于王光祈“有力的宣传和鼓动，成都出刊《星期日》”。

成都的《星期日》刚一创刊，王光祈就通过他实际负责编辑的《少年中国》杂志* 进行宣传。该杂志指出：“《星期日》系成都出版的周刊。他的内容形式与北京《每周评论》一样，亦是一种传播新思想的出版物。”⑤

王光祈还从稿件和购置图书等各方面帮助《星期日》周刊。不仅自己向该刊撰稿，还积极请其他人投稿。例如，该刊《社会问题号》刊登的潘大逵写的《我底改造》一文，原是潘准备赴美国留学前在四川学生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的讲话。后来，经王光祈等人向潘介绍说成都《星期日》特别增刊需要稿件，请给予帮助，潘才向《星期日》投稿的。少年中国成都分会和《星期日》刚开办时，很需要购置新书报。由李劼人写信给王光祈说：“现‘愈新愈好’尽多购寄。……请均由兄处每次用快邮寄下。”⑥将大学出版书籍，及各书局出版之书报杂志，我辈所宜阅看者。在最为紧要之事，即为置备书报。已集有购书费三十元兑上。请王光祈得信后，即由他任执部主任之“总会代为置办一切矣”。

* 《少年中国》杂志的编辑主任是李大钊同志。但，因李大钊有事未到任，故该刊的一至七期，实际上是王光祈负责编辑工作。

王光祈与四川工读互助团

“五四”时期，王光祈向往社会主义，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贫穷的国家。究竟建立一个什么社会主义呢？他主张“现在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推翻不可。”“将来的组织，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⑦]1919年7月，王光祈吸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创造了他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他先提出建立新农村的思想。（即组织一批人到乡村种菜园，每日种菜二小时，读书三小时，译书三小时，劳动所得收入为共同的生活费。其余时间游戏和读报。）由于这一方案难于实行，他又主张在城市组织工读互助团，幻想实现“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并在蔡孑民、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支持下，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各地实行起来。

这时，他还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和《星期日》周刊，在四川宣传他改革社会的主张。1919年7月，他曾想回四川建立自己幻想的新农村乐园。他同当时在重庆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刘泗英的通信中说：“我现刻最厌恶都市生活，急欲到农村与‘自然的美’接近。……但是与一般隐居先生却大不相同。因为我是主张积极的、奋斗的、生活的”。[⑧]随着他的思想变化，他又通过《星期日》宣传工读互助团。1920年初，他亲自给《星期日》写了《一个社会问题》一文，并附寄上工读互助团

章程，皆刊登于《星期日》上。文章指出："中国社会上有一个顶不好的现象，就是作工的人不能读书，读书的人不愿作工"。认为作工的不读书，"生产力必无进步的希望"，"民主政治不能运用"；读书人不作工，必然身体虚弱，生计和研究学术成问题，"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存在隔阂"。文章提出克服以上问题的办法，一是多办平民夜校，补习学校，平民教育讲演等方法，使作工的人有读书的机会；二是组织工读互助团，使读书人做工。文章进一步阐明了组织工读互助团的意义。认为它可以使青年人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培养青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有读书的机会和培养互助劳动的习惯。特别是他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新生活实现理想的第一步"。"若工读互助团成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步实现"，那便可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⑨因而，组织工读互助团是社会改革实际运动的起点。

由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和成都《星期日》的积极宣传，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思想，对四川有一定的影响。一些青年积极赞成这种组织，认为是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好办法。例如，当时成都有一个教会女子学校的帝国主义分子，强迫一个家境贫寒、靠教会培养的女学生同一个教友结婚。这个女学生才 15 岁，那个教友是成年人续弦。女学生极不愿意，只得逃离教会学校，躲避在同学家里，生活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写文刊登在《星期日》上，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办的教

会学校强迫女学生结婚是无理的。同时，提出“现在要救济这些可怜的女子，顶好仿照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办法”，“靠自己劳动的关系，来维持自己学业的进行。这种组织应该赶快成立，万不可缓了。”[10]《星期日》周报社为建立新社会，也积极组织小团体，并准备向工读互助团过渡。例如，1920 年 2 月 1 日，该社给杨先生的信中说：“我们想建设新社会……便当有新社会的雏形——小团体共同生活的实验——所以我们先从提倡劳动下手。加入学生劳工送报和请人卖报的小朋友，再求有觉悟的工人，使他们有明确的知识……构成了自家的种种理想生活，然后再来组织一种团体——如工读互助团——先试验小团体共同生活，再说其他的建设问题。”[11]又如，在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思想影响下，1921 年 8 月 18 日，由屈梅痴、罗直方、沈斌、王季瑶、关泽三、侯泽民、沈质清、金义凭等人发起组织了四川工读互助团，向当时政府当局写了立案呈文，还制定了四川工读互助团暂行简章。[12]后来，随着北京、上海等地工读互助团试验的破产，四川的工读互助团的试验也必然失败了。

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思想，实际上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的的新村主义的集合体，显然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历史实际证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妄图采取“平和的经济革命”是不可能的，行不通的。历史实

际证明，在旧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搞任何新生活的试验，都免不了受当时社会的支配和阻碍。历史实际证明，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很低的情况下，搞什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必然要遇到经济上的困难，生活难以维持，和思想上的混乱、分歧，以致无法克服，宣布解散。显然，这种空想的乌托邦是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不能作为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只能是幻想的武器”。

但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思想无疑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首先，它要建立新社会，改革旧社会，对反帝反封建是有积极作用的。其次，虽然，它是空想的乌托邦，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可是，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确也“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思想，包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思想”⑬，还包括工人不读书，社会生产力不能进步，民主政治不能运用，知识分子要参加体力劳动；以及“将来世界改造劳动阶级必占优势，已无疑义”等思想。再则，“五四”时期，正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实际上是我国进步思想史的一个阶梯。它的破产和失败的教训，教育了许多中国和四川的先进分子，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总之，我们认为他的这一思想应该在中国现代思想进步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王光祈与《新四川》

1920年初，在北京的四川学生有四、五百人左右。可是，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四川学生思想颓废不振，如参与嫖妓，参加赌博，据初步调查达四川在北京的青年学生的十分之七。还有依附和追随于封建军阀和官僚者亦不乏人。为了挽救这些四川青年，使之健康成长，能以奋斗的生活改造萎靡不振的四川社会，在北京的四川人北大教授陈启修、孟秦椿和王光祈等人特组织《新四川》杂志社。规定社员不嫖妓、不赌博、不娶妾三条戒约。要求四川青年树立真实奋斗之精神，砥砺学行，提高文化科学水平，以达到创造新四川之目的，并应为创造“新世界”的一部分。该社还制订了章程，规定了宗旨和任务，决定设通讯联络机关，以备在外留学四川青年购书等事的询问，和开展其他文化活动。并设编辑主任、编辑、书记和各地通讯记者多人。规定入社条件必须是赞成本社宗旨，经本社人员5人以上介绍才得成为该社社员等等。[15]

成都的《星期日》周报社积极欢迎《新四川》杂志社的成立，即函告他们说：“盼望你们的《新四川》早日出版。”

总之，在“五四”时期，王光祈身在北京，确积极关心和支持帮助了四川的革命斗争和四川黑暗社会的改造，渴望四川新社会的建设，对这一时期四川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王光祈对四川革命斗争的支持和帮助，使部分四川青年对他确有感激之情。如《星期日》周报社说："四川青年得了外面振作朋友、奋斗朋友的感化，颇有许多闻风兴起的。""单举'少年中国学会'中有创造生活的人而论，川中得他们的益，确实不少。"⑯显然，这首先要算王光祈了。

〔注〕

①李劼人：《自传》，《李劼人文集》第1卷。

②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川西日报》1950年5月4日。

③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55页。

④李劼人：《自传》，《五四追忆王光祈》。

⑤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

⑥李劼人：《给王光祈等的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⑦《王光祈致君左》，《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94页。

⑧《王光祈致刘泗英》，《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⑨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

⑩半点：《强迫得岂有此理》，《星期日》32号。

⑪《星期日》周报社：《给杨先生的信》，《星期日》32号。

⑫四川工读互助团立案呈文和简章存成都市档案馆。

⑬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单行本。

⑭王光祈：《一个社会问题》，《星期日》社会问题号。

⑮成都《国民公报》：《四川留京学界之新纪元》，1920年2月11日。

⑯《星期日》周报社：《给杨先生的信》。

王光祈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作用浅探

程国平

王光祈（1892—1936），字润玙，亦字若愚，四川温江人，是我国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曾参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与李大钊等七人发起并组织当时规模最大的著名社会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刊物，宣传新文化，研究新思想；先后介绍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赵世炎等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李大钊、瞿秋白一起担任《晨报》编务，在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下，在北京组织轰动全国的“工读互助团”，探索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道路。这段时期，王光祈参加革命活动频繁，发表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颇丰，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积极宣传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

一、王光祈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经过及内容

我国五四运动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曾一度流行，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尤为突出，王光祈就是这种空想社

会主义的典型代表。

王光祈少年时代，就受他的塾师蒋春帆、黄玉珊等当地激进人士的教育和影响；中学时期，在成都受到激进、改革维新思想的熏陶，特别是直接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拥护辛亥革命等活动，使他的激进思想更加趋于成熟。后来在北京求学的半工半读期间，又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有密切联系，使他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向空想社会主义者。

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 1918 年春夏已有酝酿。他在《东方杂志》上撰文说："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国家，改变成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1] 1918 年冬，他在为《每周评论》创刊号撰写社论《国际社会之改造》，初步提出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改造方案。[2]他在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同时，于 1919 年春，提出"新生活"主张，[3]并在南京与左舜生进行过一些讨论。1919 年 7 月，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小组织的提倡》一文，提出要"由少数同志组织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脱离家庭，过共产式的生活"，以解决"愚昧"、"生计艰难"、"缺少精神修养"等三种缺陷。王光祈读了这篇文章后，给左舜生写信，说"欢喜得连吃饭都忘了"，除了赞成左舜生的意见外，还主观设想"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4]系统描绘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一个桃花源式的菜园子：

菜园子的地点，要建在城市附近，不要太近，也不

要太远；其规模“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出于卫生考虑，厨房和厕所分置底楼东北角和西北角；还考虑到锻炼身体，在房子后面建一个球场。为了美化环境并与外界分开，要在菜园子四周挖一条小溪，溪边栽柳树，“柳树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子。”

菜园子内的生活安排，“（一）种菜两钟[5]；（二）读书三钟；（三）翻译书三钟。其余钟点作为游戏、阅报时间。”这么安排的理由是：种菜“易于学习”，“收效最快”，而且于“身体有益”；读书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快慰生活”；翻译书是为了对社会作贡献，让外文书刊与所有人共享，从而实现“文化交流上的火车头”。

除了菜园子生活外，还要参加社会活动：一是教化农民。在菜园子里办平民学校，每逢星期天开讲演会、放幻灯、放留音机，“使他们大家快活”。二是妇女问题。“妇女问题不解决，我们新生活园里一定充满不快的空气。”因此，女子“只要品性纯洁，而她丈夫都有这小组织的资格，应得一同加入，”并“经常召开男女共同参加的茶话会，讨论人生问题”。

以上便是王光祈为我们勾画的一个用小溪、柳林、竹篱与外界隔离的菜园子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尽管在当时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但这是他理想中新社会的缩影，也是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赞同的社会。在我们现在看来，虽然他的设想很幼稚，过于理想化，现在人们的现

代化生活方式，他当时怎么浪漫也想象不到，可在当时，要有这样的追求，却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是贫穷落后的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们的温饱尚不能解决，幻想人们去过“菜园子”式的生活，只能是一种空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的这种菜园子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迅速破灭了。

既然这种“菜园子”式的农村新生活不能实现，王光祈就把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转为城市新生活。1919年12月，他发表了《城市中新生活》一文[6]，提出建立城市乌托邦。他在文中强调“新生活由乡村转到城市，也由桃花源式的菜园子变成了工读互助团。”“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项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这个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小团体——“工读互助团”，其宗旨是“为苦学生开一个途径，为社会筑一个基础”，“本互助的精神，实现半工半读”。“工作所得为团体所有”，参加互助团的成员所需衣、食、住、教育、医疗、书籍等，由团体供给，“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便可由团员自由取用，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互助团的工作主要是手工和贩卖，实行“各尽所能”的原则，工作量以时间计，而不以效率计，每日工作六小时（后改为四小时）。互助团实行民主管理，由全体人员组成“团员会”，推举事务员并决定各种重要事情。事务员每月民主选举一

次，管理日常事务。

1919年12月中下旬，王光祈以著名团体“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的身份发起“工读互助团”，半月后在北京组织成功。这时又得到新文化著名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帮助、募捐和撰文宣传，被视为“破天荒的创举”。王光祈被美好幻想的光环所陶醉，他宣布“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7)蔡元培也指出：“要是这种小团体一处一处地布满了，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要是感动了全国各团体都照这样做起来，全中国的重大问题也可以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世界上最重大问题也统统解决了，这岂不是最大的希望么？”(8)可惜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不可能给这种进步组织以立足之地的。这种美好的愿望只能昙花一现，“工读互助团”只成立一个多月，便夭折了。

王光祈不甘失败，认识不到在旧制度下这种改良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而把失败归结于“全是人的问题”，他对“工读互助团”仍抱“十分信仰”、“十分希望”。(9)在北京“工读互助团”解散后不久，他又于1920年2月29日，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发起人有王光祈、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等26人。同年4月1日，王光祈赴欧留学。同年6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写信给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停止。”至此，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理

想和实践基本结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王光祈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和主要来源

王光祈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走向空想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思想基础是复杂的。

王光祈的父亲早逝，作为遗腹子，从生下来开始就未得到过父爱。青少年时期，孤儿寡母的清苦生活和寄人篱下的坎坷经历，使他一方面养成了愤世疾俗、不满现实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具有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知识分子软弱怯懦、耽于幻想的弱点。他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受封建传统文化的教育，又使他对中国古典著作中描绘的大同思想、遁世的桃源思想充满了热情的向往，从而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中国的世外桃源。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立场上，王光祈大量地吸收了外来的种种社会主义学说，在书斋里制造美好的理想，构成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主要来源有：

一是日本武者小路推行的“新村主义”。[10]贵族出身的自然主义作者武者小路，不满资本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种种弊病，采纳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按傅立叶、欧文设想的所谓共产主义“新村”，拼凑出他的小农空想社会主义主张：幻想脱离黑暗社会，结合一群人，另辟一个小天地，建立一个自给自足，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幸福、互助友爱的理想新社会。并于1918年在日本九州日向组织“第一新村”，曾风靡日本，并迅速传播到中国，激起中

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陈独秀、李大钊曾肯定“新村主义”，并在《新青年》上多次撰文介绍，王光祈自然也十分赞赏这种“新村”，并把它当作中国新时代的桃源加以推崇。他后来的“菜园子”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应该说是直接脱胎于“新村”。

二是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泛劳动主义传到中国，当时被人们当作社会主义。王光祈当时很推崇托尔斯泰，认为他是当代伟大的社会改革家：“若托尔斯泰者，则吾只有歌之咏之以表其崇拜信仰之热忱，奉为吾党社会活动唯一无二之昆师也”。[11]

三是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互助论被传播到中国，也曾被一度当作社会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传到中国，十分遗憾的是，王光祈竟然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集产主义”加以排斥，而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社会主义[12]，称赞其“是一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建设的”，是要实现“一种极公平极快乐的互助社会”。并且把克鲁泡特金的一些社会设想奉为圭臬，当作标准处处向人宣传。

四是中国传说的出世主义、“兼爱”、“大同”思想。王光祈自幼接受传统教育，他常常把庄子的出世主义与日本的“新村主义”相揉合，把墨家的“兼爱”思想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把儒家的“大同”思想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混在一起，把晋代陶渊明的“桃园”式生活改造为近代的“菜园子”生活，从狭小的书斋里，对上述传统思想和“舶来品”进行搅拌综

合，创造出他的“菜园子”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

三、王光祈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

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经历了十六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三百多年的漫长道路。十九世纪初，在英、法两国产生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空想社会主义推向最高阶段，为日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起到了推进和探索作用。尽管尔后逐步衰落，成为落后于时代的，并渐渐被人遗弃的思想流派，而在当时的中国，民族灾难、社会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一些先进的人物为了摆脱民族危机，解决社会矛盾，便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并将其和中国古代思想宝藏中的大同思想混为一体，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企图以此唤起人民大众，革新社会，求得中国的新生。在我国近代史上，大家都熟知的，影响特别巨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三个代表人物：一是洪秀全（1814—1864）创建的“乌托邦”式的“太平天国”——具有中国特色的朴素农业空想社会主义；二是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之世”式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是《大同书》；三是孙中山（1866—1925）的民生主义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在“五四”时期，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占据了一席重要的地位，曾经给当

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震撼，并吸引了许多著名人士的参加，其中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王光祈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主要有：

1、对国外先进思想的传播作用

王光祈在创建并实践“菜园子”式、“工读互助团”式空想社会主义过程中，顺应五四运动的历史激流，大量宣传国外的先进思想，传播新思想，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从专注于资产阶级民生主义、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使先进知识分子由新文化运动向无产阶级思想运动转变。

2、对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我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引进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甚至把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也当作社会主义宣传，王光祈也不例外。但由于他崇尚中国古典小农经济大同思想，所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鸡犬之声相闻”的牧歌式的、和谐恬静的世外桃源，并付诸于实践，极大地影响人们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新生活。

3、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五四运动中，王光祈组织著名的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在众多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新文化。其中对五四运动起积极作用最大的，就是他大力宣扬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及实践。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工读互助团”对新生活的实践，又把

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孕育了条件。

4、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探索作用

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生在中国革命大风暴来临的前夕（一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他强烈的实践性，号召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实现大同生活，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虽然王光祈空想社会主义只进行了一年时间便流产了，但它却使初具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看清了中国的前途——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特别是王光祈组织的“工读互助团”这种团体的解体，更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毛泽东等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在中国也是没有出路的。这些失败的教训，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了悲剧式探索者的作用。

王光祈一生品行高尚，正直爱国，即使留学欧洲，依然把自己的命运始终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他为了改造旧社会，追求新生活，选择了空想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尽管因脱离中国实际而没有取得成功，但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中华振兴而终生奋斗的高尚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新中国成立后，开国领袖毛泽东几次查找王光祈的下落，寻找王光祈的亲属，表示伟大领袖对他的怀念。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正确评价。

注释：(1)《东方杂志》第15卷第3号；

(2) 王光祈：《国际社会之改造》，《每周评论》创刊号；
(3) 王光祈：《与左舜生书》，《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4) 同（3）；
(5) 钟，即钟点，指一小时；
(6)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
(7) 同（6）；
(8) 蔡元培：《工读互助团的大希望》，《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9) 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1920年6月7日；
(10)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第一卷第6号；
(11) 王光祈：《学生与劳动》、《晨报》1919年2月25日；
(12) 王光祈：《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第18号。

56 年前的一篇纪念文稿

郑华钰

1946 年 4 月 5 日“音乐节”这天午后，为纪念王光祈先生逝世十周年，温江县民众教育馆在文庙大成殿对面的大厅堂举行纪念会，并举办了“温江县各界纪念三十五年度音乐节音乐晚会”，出席大会的有县城中、小学校师生及各界人士。纪念会暨音乐晚会中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由王光祈先生生前的同学、同乡好友、温江县中学校长何拔渠（学章）先生讲述音乐家王光祈先生生平事迹。

据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段启诚先生（温江籍）在《循着开拓者的脚迹前进》一文中的回忆：“1946 年我在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肄业时，偶回温江探家，适逢温江县的文化教育界正借举办‘音乐节’的机会同时纪念王光祈。开会前遇到我读小学时教音乐的姜老师，她临时要我去参加纪念会，并通过她的联系让我在这个音乐会上参加一个独奏节目。记得纪念音乐会是在午后开始的。开会及演奏的地点是在孔庙大成殿对面的大厅堂。会场正中一团洁白的花朵丛中，悬挂着一幅大大的王光祈的素描画像：他的脸庞轮廓鲜明，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端正而大方的鼻翼，下面是一张微闭着的线条分明的嘴唇，整个相貌给人一种刚强坚毅而又显得平易近人

的深刻印象。在这次纪念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画像，第一次听到何拔渠先生对他的一生作了较为翔实的评述，他的刚强坚毅的形象，他的艰苦奋斗救中国的社会活动，他的严格科学的治学精神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敬慕感情，在我的思绪中萦绕着，久久不能排去。”

笔者八十年代在文化馆工作时，因为编写《温江县志·文化编》的需要，曾经看到这个晚会的节目单和何拔渠先生讲稿的油印件，共两张，均为八开纸，繁体字，竖排刻写，均署“温江县立民众教育馆印”。在《王光祈先生事略》那张上，还刻印有王光祈先生头像。据当年曾任温江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杨世茂老先生生前向我介绍，这两张油印件都是由当时在温江县民众教育馆工作的革命先烈陈天钰同志（中共地下党员，十二桥烈士）刻印的。

今年公历 10 月 5 日是王光祈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按：王光祈先生诞生于 1892 年 10 月 5 日，农历八月十五日），现特将 56 年前何拔渠先生在“温江县各界纪念三十五年度音乐节音乐晚会”上所作的关于王光祈先生生平事迹的介绍文稿并音乐晚会节目单抄录如后。文中疑为脱字处加“［］”，明显别字后加“（）”注明，难以辨认、考核之字用□代替。

[附一]

纪念三十五年度音乐节介绍［乡］贤王光祈先生事略

十年前，在德国莱茵河畔，乐圣悲多汶（按：即贝多芬）的家乡，死去了我们中国的嚣俄（按：即雨果，法国作家），社会的怪杰，温江的乡贤——王光祈先生，这不仅是乐坛上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并且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极大的不幸。王光祈虽然是在他奋勉苦学的征途中，结束了他的伟大的一生，去安眠在异国的土中了，可是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到今天谁还想得到当时以身殉学的王光祈先生，就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忠勇战士，谁还记得到这一位中国知名的爱国音乐思想家，也就是过去我们温江的一个穷苦的儿童。我们追念过去，痛感将来，王光祈虽然是已被上天把他从一个大有可为的五大洲，措手不及的唤了回去，可是，他的不朽的事业和治学的精神，尤其是对于音乐的造诣，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今天借着举行音乐晚会的机会来表彰他的事迹，这确是最恰当而有意义的了。

王光祈先生，温江人，字润玙，一字若愚，是他父亲茂生的遗腹子。他的一生都是过着坚（艰）苦卓绝的生活，幼年时节就依靠他的寡母生活，家境极清贫。当时，仅有温江西门外一个锅厂的一点收入。先生在幼年时代，因为就受了刻苦的训练，所以，他在后来能够刻

苦自励，过度着卅余年始终如一的勤工俭学的生活。祖父泽山先生，是温江有名的诗人。大概他后来国学根基的源泉，恐怕正因为是“诗人之后”的关系。一九一三年，卒业成都中学后，就到北京中国大学学了四年法律。据说：他小时候能够读书，纯粹是他祖父的门生赵尔巽资助的关系。一九一八年，创立少年中国学会，发行两种月刊，即《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奋斗，实践，坚忍，检（俭）朴。”充满着少年中国精神的王光祈先生，真不愧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伟大思想领袖了！

一九二〇年，先生始出国留学，初在柏林任申报通讯记者，一面读书，一面工作。两年后，他发现对于音乐有特殊兴趣，可以作为今后一生事业的目标。大致他专攻音乐的主要目的，还是创造发扬□□的新国乐，以复兴祖国。所以，王光祈先［生］曾说，“要以音乐再造中华民族”。可是他是音乐兴国主义的坚决信仰者，这种创立“伟大国乐”，“引起民族自觉”，“陶铸民族独立思想”的最高理想与精神，还是由于少年中国运动蜕化而出的。所以在一九二五年苦学于柏林，制作《少年中国歌》，高唱“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亚洲东”的王光祈先生，当然要比（媲）美“坟墓开夕，烈士起兮”的“加利波的曲”的制作者麦克梯尼氏了。先生改攻音乐后，初在柏林一个音乐专科学校中研究。一九二七年，始正式入柏林大学习音乐学，竟于一九三四年德

国波恩大学，戴上了博士的荣冠，并担任该校讲师。他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歌剧》，这是当时德人认为仅有一二位欧洲人做过一些科学的研究领域。就是在我国，音乐科学的研究，也还是在萌芽之中，他留德十六年，前后著作不下四十余种。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精华到祖国来，并且应用西洋的方法，来整理那至今还少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一方面，王光祈先生可以说是第一个前驱者。他写了很多音乐书籍，最著名的如《中国音乐史》、《对谱音乐》、《各国国歌详述》、《关于琴谱之研究》，以及关于欧洲音乐的著作。同时，先生从事于历史及文化的研究，在这方面，他译了瓦德西的《拳乱笔记》，维德（按：即俄国沙皇时代国务总理维特）的《李鸿章游俄记（纪）事》，海尔法里［耶］对于财政的演说（按：指德国战时财政大臣及内务大臣海尔法里耶所著《世界大战》，书中论及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德国哲学家法而克关于远东的著作。嗣后，先生并参加了英国百科全书及意大利百科全书的编辑。因此，声名大震于海外。这真是我们中国留学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不过，王光祈先生除在音乐上面的成就外，还有值得我们敬颂的地方。因为，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音乐思想家，同时又是史家、新闻家、青年运动的先锋、文艺复兴运动的战士，更是一位勤工俭学的前驱。他在大学时代与陈独秀等共营工读互助团，从温江到德国的光祈生活史，可以说完全是一部勤工俭学史。所以，他的清

苦精神和纯洁的人格，都是从他的俭德中放出来的光芒。王光祈在德国苦学十余年，原有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归国之议，不幸在正月十二日，突以脑充血症逝世。不似永年而幸运的嚣俄，达到社会□□□□□□□□□！□□□□□□□□，这□□是□令人惋惜的啊！

温江县立民众教育馆印

［附二］

温江县各界纪念卅五周年音乐节举办“音乐晚会”节目

一、国歌（男中校） ［四部合唱］
二、主席报告

鱼凫中心校
三、纺纱娘 ［四部合唱］
四、插秧歌 ［齐唱］
五、我先唱 ［二部合唱］
六、工作以后 ［齐唱］
七、美丽的青春 ［歌舞］
八、口琴独奏 ［张国光先生］
九、苏三不要哭 ［歌舞］
十、何拔渠老先生讲述本县音乐家王光祈先生生平事迹

鱼凫一分校

十一、青春战斗曲　[齐唱]
十二、黄昏夜色何等美丽　[轮唱]
十三、海底夜涛　[独唱]
十四、蝴蝶鞋　[歌剧]

温江男中校

十五、春夜　[重唱]
十六、佛曲　[四部合唱]
十七、满场飞　[舞蹈]
十八、踏雪寻梅　[独唱]
十九、双莺进行曲　[风琴独奏]

温江女中校

二十、联合国歌　[合唱]
二一、卢沟桥问答　[合唱]
二二、你这个坏东西　[合唱]
二三、大家唱　[合唱]
二四、凭吊　[独唱]
二五、试马　[独唱]
二六、农人舞　[歌舞]
二七、工人舞　[歌舞]

鱼凫二分校

二八、夏日之乐
二九、夏天已经来到了
三〇、我爱
三一、虫的音乐

温江县立民众教育馆印

王光祈博士著译歌曲选

郑华钰　选编

王光祈（1892.10.5.—1936.1.12.），四川温江人，是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近现代音乐史上著名的音乐学家、音乐史学家。他早期曾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与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并先后介绍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加入该会。其后，他又在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下在北京组织“工读互助团”，为探索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道路作了不懈努力。1920年，他以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特约记者身份赴德国留学，研习政治经济。1921年起改习音乐，1934年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1月12日因患脑溢血症，客逝于德国波恩医院。

王光祈先生一生著述宏富，计专著四十种、论文百余篇，其内容范围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艺术等许多方面，尤以音乐学著述成就斐然，举世瞩目。他通过《中国音乐史》、《欧洲音乐进化论》、《中国诗词曲轻重律》、《翻译琴谱之研究》、《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音学》等多种音乐专著，在注重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介绍于西方的同时，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了西方各国的音乐活动状况及音乐科学与作曲理论，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是

他在“比较音乐学”这一领域所作的开拓性工作，更是奠定了我国和东方“比较音乐学”的基础。他一生坚持民主爱国主义，热爱祖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努力探索创造具有民族特点的“国乐”，力图发扬民族音乐传统，“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现出来，使一般民众听了，无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

王光祈先生作为一位音乐学家，在研究音乐理论、编写音乐专著之时，还十分重视国内幼儿音乐教育，前后编写了十多首儿歌，邮寄国内作小学唱歌教材。音乐泰斗抓基础，大家重视“小儿科”，这更是十分难得而可贵的。

1928年3月，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华教育界》十七卷三期上发表王光祈先生《小学唱歌教材》一篇，文前编者按语说：“小学唱歌教材，新鲜合用者绝少，兹本局请王光祈先生编有《小学唱歌》一巨册，不日刊行，特录一部分在本志发表，以快先睹。”该期刊登王光祈先生所编写的《黄河》、《种豆》、《燕子》、《冬天冬天》、《家书》、《谁愿知道》、《兵士》、《田家四季歌》、《跳舞》共九首儿歌的词曲，用五线谱刊印。这九首儿歌的歌词均系王光祈先生自作或译编，曲调或取自德国唱歌教材，或取自中国旧谱。据专家分析，这九首儿歌的编写年代约在1925～1926年期间。

此外，王光祈先生早于1924年5月所著《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7月出版）一书中

曾录由其译词的德国歌谣，中有《春使》和《妹妹愿否同跳舞》（按即上述《跳舞》）二首；1926年所著《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中华书局1927年2月《中华教育界》发表）一文中除附上述《黄河》一首外，另有《春使》、《平沙落雁》两首歌词。

为了广泛宣传王光祈先生的光辉业绩，兹将先生译著歌曲九首由五线谱译成简谱汇编一集，以便广为传唱，并以此作为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献礼。

黄　　河

1=D　4/4　　　　　　　　　　　　王光祈 作词编曲

2 - 1 - | 6 - 5 - | 5 4 3 2 | 5 - - 0 | 3 3 3 5 |

黄　河　　黄　河　　之水真正　黄，　　　好象豌豆

长　城　　长　城　　听了不服　气，　　　偏要试一

6 - - 0 | 6 5 4 3 | 1 - - 0 | 3 6 5 3 | 2 - 3 2 | 1 - - 0 ‖

汤，　　自称北方 王，　　谁敢和他　比　短　长。

试，　　由西筑到 东，　　从此黄河　有　兄　弟。

编者注：本首儿歌系王光祈先生作词编曲。王光祈先生在《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中曾对该首儿歌词曲作出说明："譬如《黄河》一歌（见拙著初级小学音

乐用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调子，系我从中国旧谱《望妆台》内摘出，而稍稍加以更改者，歌词则系我自己著的。”

本首儿歌歌词用了拟人、比喻等修辞法，符合儿童的心理，如以豌豆汤形容黄河水，极易引起儿童的联想。通过黄河、长城由“自称北方王”、“偏要试一试”到结为兄弟的咏唱，歌颂华夏文明，寓知识性于趣味性之中，向儿童进行陶冶民族意识的教育，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正是本首儿歌思想性之所在。

种　　豆

1=D　4/8　　　　王光祈 作词编曲

6 4 3 | 1 1 | 3 4 5 | 6 1 3 | 4 4 |
南 山 下，种 豆 子，清 早 起，将
草 头 露，沾 衣 履，沾 衣 履，不

5 3 2 | 1 3 3 6 | 4 3 1 3 | 1 0 ‖
草 理，晚 来 月 下 荷 锄 归 家 里。
要 悔，只 望 我 的 豆 儿 长 得 美。

编者注：本首儿歌可谓劳动歌，系王光祈先生作词

编曲。歌词不用传统民歌常用的七字四句的格式，却采用“三三、三三、九”的长短句式，颇有古词的韵味，而词句通俗易懂，节奏明快，适合儿童演唱。

燕　　子

1=D 2/4　　王光祈 译词配歌

‖: 1 1 | 3 3 | 2 2 | 1 1 | 3 3 |
燕子　尾巴　好象　叉叉，　一年
春来　避暑　秋来　避寒，　不怕

5 5 | 4 4 | 3 - :‖ 5 5 | 6 6 |
要搬　两回　家.　　但愿　我们
辛苦　不怕　难.

4 4 | 5 - | 3 3 | 4 4 | 2 2 | 1 - ‖
寒暑　假，　得与　燕儿　一堆　耍.

编者注：本首儿歌系王光祈先生根据德国民歌译词配歌。译词语言精妙，具有儿童口语化的特点，歌词同时参用比喻、拟人两种修辞手法，将燕子的尾巴比喻成

“叉叉”，形象贴切；将燕子这种候鸟春来秋去的迁徙视如人类在“搬家”，生动活泼。末段两句用儿童口吻表达孩子们对燕子的期待，这也正寄寓了作者对春天的向往。

冬 天 冬 天

1=D 3/8 王光祈 译词配歌

3 3 2 | 1 0 | 3 3 2 | 1 0 | 3 4 5 | 5 43 4 |
冬天 冬 天， 别 了 别 了， 被你关 在 家 中，
冬天 冬 天， 别 了 别 了， 你若今 年 再 来，

2 3 4 | 4 32 3 | 3 3 4 | 5 · | 3 3 2 | 1 · ‖
好 象 笼 内 小 鸟，小 鸟 小 鸟， 关 不 住 了．
千 万 不 要 太 早，冬 天 冬 天， 别 了 别 了．

编者注：本首儿歌系王光祈先生根据德国民歌译词配歌。歌词通过孩子们向冬天告别，反映了作者对封建专制的憎恶和对自由的追求。歌词采用短句形式及比喻、拟人、反复等修辞手法，符合儿童心理，亦适合儿童演唱。

家　　书

1=C　2/4　　　　　　　　　　王光祈 作词编曲

```
5  6 | 5· 3 | 2 - | 3  5 | 6· 7 | 6 - |
客 从  远 方  来，   交 我   一 封   信，
中 有  发 信  日，   下 有   发 信   地，
3  2 | 5· 6 | 3 - | 5  3 | 3· 5 | 6 - ‖
信 上  有 邮  花，   花 上   有 邮   印。
知 是  故 乡  来，   不 读   已 欢   娱。
```

编者注：本首儿歌系王光祈先生作词编曲。歌词八句分作两段演唱。全首恰如一首口语入诗的五古，短短的四十个字，便把异乡游子接到家书时的心情刻画得栩栩如生，充满着浓郁的乡情，这正是作者客居异国而心系故园的心境表露。歌词用了顶真格修辞法：“……交我一封信，信上有油花，花上有邮印”，使语句递接紧凑而生动流畅，且不言邮票、邮戳而言“邮花”、“邮印”，则更显通俗。第二段详写看“邮印”上的发信日、发信地，这是符合收信人接信后心理愿望的逻辑的，当收信人知道这信是从故乡来的家书时，自然“不读已欢

娱”了。

谁愿知道

1=D 3/4 王光祈 译词配歌

1 3 | 5 5 1 3 | 5 5 i i | 7 4 6 6 |
谁愿 知道，谁愿 知道？小女 孩子怎样
谁愿 知道，谁愿 知道？小男 孩子怎样
谁愿 知道，谁愿 知道？大女 孩子怎样
谁愿 知道，谁愿 知道？大男 孩子怎样

5 3 1 3 | 5 5 1 3 | 5 5 i i | 7 6 7 | i - ‖
玩闹。常把 枕头，当作 儿抱，乖乖 快些睡 觉。
玩闹。常把 手棍，当作 枪炮，瞄准 品棒打 倒。
玩闹。拿着 镜子，细看 容貌，照了 又照再 照。
玩闹。骑着 马儿，扬鞭 高叫、快跑 快跑快 跑。

编者注：本首儿歌系王光祈先生根据德国民歌译词配歌。译词口语化和诗化融汇一体，显得生动活泼，意趣横生。四段歌词分别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男女儿童（即小女孩、小男孩、大女孩、大男孩）的心理、行为特

征，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充满了儿童乐趣。

兵　　士

1=^{b}D　4/8　　　　王光祈译词配歌

2 | 5 5 5 5 | 7 5 2 | 7 5 7 5 | 2 0 2 | 6 6 6 6 |

当 兵的若是 听 见打 战鼓，排队 伍． 倘 若是我们

当 兵的若是 听 见吹 军号，放步 哨． 倘 若是我们

当 兵的若会 打 枪放 大炮，有赏 犒． 倘 若是我们

i 6 2 | 7 5 6 2 | 5 0 7 ‖: 5 0 7 :‖ 5 7 5 7 | 5 0 ‖

亦有战 鼓打，真好 耍． 冬 冬 冬 冬冬冬冬 冬．

亦有军 号吹，将敌 追． 务 都 务 都务都务 都．

亦有枪 炮放，将敌 抗． 品 棒 品 棒品棒品 棒．

编者注：本首儿歌系王光祈先生根据德国民歌译词配歌。歌词反映了儿童喜欢模仿大人行为的性格特征。每段歌词的末句分别用象声词“冬冬”、“务都”、“品棒”来模仿战鼓、军号、枪炮的声音，使歌曲的童趣倍增。

田家四季歌

1=D　2/4　　　　王光祈 作词编曲

5 43 | 2 5 | 43 2 | 2 3 | 7 6 | 2 3 |

春 季 里，春 风 吹，花 开 草 长 蝴 蝶

夏 季 里，农 事 忙，才 了 蚕 桑 又 插

秋 季 里，稻 上 场，谷 象 黄 金 粒 粒

冬 季 里，雪 初 晴，新 做 棉 衣 软 又

5 2 | 4 5 | 3 2 | 6 5 | 4 32 | 1 0 ‖

飞。麦 苗 儿 秀 了，桑 叶 儿 正 肥。

秧。早 起 勤 耕 作，归 来 带 月 光。

黄。身 上 虽 辛 苦，心 里 却 安 康。

轻。一 年 农 事 了，饱 暖 笑 盈 盈。

编者注：本首儿歌系王光祈先生作词编曲。歌词句式整齐，节奏协调，有宋词韵味。用词讲究修辞又兼容口语，可谓诗化的口语，口语化的诗。四段歌词分别讲述一年四季的乡村风光，均抓住了典型的特色：春季，花艳蝶舞，麦秀桑肥；夏季，才了桑蚕，又忙插秧；秋季，收获稻谷，满坝黄金；冬季，新做棉衣，迎接新

年。这是儿童眼里的农家乐，也是作者对自己幼年时期在川西坝生活的回味。本首同《种豆》一样，形象化地体现了王光祈先生在《少年中国歌》中宣扬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万事皆自为”的思想。

跳　　舞

1=D　4/8　　　　　　　　　　　　王光祈译词配歌

1 4 4 4 | 3 5 1 | 1 3 5 7 | 6 i 4 |
姊妹愿否 同跳舞，我的手儿 给与汝．
汝之游戏 真正妙，为我初意 所不料．
我们再来 做一次，因为心中 甚满意．

6 6 7 | 5 5 6 | 4 4 5 6 | 3 3 4 ‖
往前行，往后还，转个圈儿 真不难．
往前行，往后还，转个圈儿 真不难．
往前行，往后还，转个圈儿 真不难．

编者注：本首儿歌系王光祈先生根据德国民歌译词

配歌。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华教育界》十七卷三期载本首儿歌时，原编者注：妹妹愿否同跳舞（按此系一种民间歌谣，不知谱自何人作自何人。此歌乃系一种游戏歌调，歌唱之时，令全班儿童双双对立，每唱“妹妹”二字时则双双对鞠一躬，随将双手互握。唱到“往前行”时则往前走三步，唱到“往后还”时则往后退三步，唱到“转个圈”三字，彼此将手撒开，各转一个圈子。若全班学生均系男孩，则将“妹妹”二字改为“哥哥”。）

附：王光祈先生译著儿歌歌词二首

春　使

苦苦，苦苦，林中高叫。
我们快唱歌，我们快高跳。
看看春使，即刻来到。

编者注：王光祈先生在《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中说：“又如《春使》一歌的调子，系著者选自德国民谣（歌词则系著者译自原文）。……‘苦苦，苦苦’，系子规鸣声。其音阶为‘短三阶’Klcine Torz 或‘长三阶’Gresso Torz 以及‘纯四阶’Reine Quarte 等等，本篇歌谱之内，则系用的是‘短三阶’。所以我们只令学生连学两次‘苦苦’叫唤，已经种下一个‘短三阶’的观念了。”

平沙落雁

天上雁鹅结队飞，
地下儿童拍手追。
雁鹅会摆队，
排成八字往前进。
前进复前进，
寻个沙滩解解闷。
谱谱铺，谱谱铺，谱谱谱谱蒲。
谱谱铺，谱谱铺，谱谱谱谱蒲。
哼……
雁鹅好快活，
天地真宽阔。

编者注：王光祈先生在《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中说："譬如《平沙落雁》一歌，是我选自中国琵琶乐谱中之一段，而稍稍加以更改者，歌词则系著者自撰"。本首儿歌歌词中"雁鹅"系川西坝儿童对大雁的俗称。歌词中还连用了两组象声词，原注均有详尽的说明：谱、铺、蒲，"此系形容雁翅扑沙之声，歌者宜以唇音出之"；哼，"此系形容雁鹅依然飞到天上，怡然自得之意，歌者宜以鼻音出之"。从中可见王光祈先生用词之讲究。